ZHONGGONG HEFEI SHIWEI DANGXIAO XUEBAO

ISSN 1674-5000
CN 34-1249/Z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郭小丽等　坚持底线思维：中国共产党的制胜之道
课题组　合肥市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研究
杨艳梅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吴　昌　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2022年第5期（总第97期）
第21卷　双月刊　9月30日出版

征稿启事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是中共合肥市委主管，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合肥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本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关注改革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紧密围绕省情、市情选稿组稿，大力开展政策研究、市情研究、咨政研究和理论宣传，形成了具有浓厚时代特征、地域特点、党校特色的理论宣传平台。

本刊于2003年入编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并进入CNKI中心网站。现为《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2015年初，本刊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认定为首批学术期刊。为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将本刊打造成为“合肥市委党校（合肥行政学院）的学术名片和重要窗口”，现向社会公开征稿，热诚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惠赐佳作。

投稿须知：

1. 稿件应当主题突出、观点鲜明、论证严密、语言文字合乎规范，有独到见解，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实践借鉴价值。本刊特别欢迎关于“安徽省情、合肥市情”方面的研究报告。

2. 稿件字数以4000-10000字为宜。

3. 将正文以附件形式发过来，并将单位名称、详细地址、邮编、电话、电邮、摘要、关键词（3-5个）、来稿日期、作者简介（出生日期、民族、职称职务、学历学位、研究方向等）放在正文标题下。

4. 参考文献、注释等放在文尾，勿用脚注或夹注。注释是作者对题名、标题或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须放在正文后的参考文献之前，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加圆圈标注：①、②、③……。参考文献是作者写作论文时所用引文的出处或参阅的各种书刊资料，须集中列在论文的文末，参考文献序号标注：[1]、[2]、[3]……

5. 来稿文责自负，在不改变文章主要观点的前提下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文章作适当修改，若作者不同意修改请在来稿时作特别说明。

6. 本刊已被“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等收录，如作者无特别声明，即视为同意在网站或光盘上同时刊出。

7. 请勿一稿多投。本刊的选稿周期为3个月，3个月内未收到用稿通知的，作者可自行处理。请作者自留底稿，来稿一律不退。

8. 本刊选稿以质量为唯一标准，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来稿一经刊用即付稿酬并寄送2本样刊。

9. 本刊目前并无网上投稿平台，也未委托任何组织或个人代为征稿。一些打着本刊所谓“官网”名义的网上投稿、征稿平台，骗取作者审稿费、发表费的行为，均与本刊无关，均属非法行为。请投稿作者切勿上当受骗。

本刊样刊浏览网址：http://hfdx.hfzhi.com/

本刊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230031

联系电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

2022 年第 5 期
（总第 97 期）
双月刊

主管单位：中共合肥市委
主办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
出版单位：《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编委会主任：陈得良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俊　王辉龙　王良仲　王　义　王　玉　王智源　江　飞
江　浩　刘玉勉　孙维红　陈得良　何永义　李安福　李敏琪
李宗开　范观兵　金　玥　周良金　胡爱敏　胡厚翠　凌德政
陶晓娟　黄传霞　程千宜　瞿晓陆

主　编：马　俊
编　辑：黄宁平
朱少家
徐书琴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坚持底线思维：中国共产党的制胜之道……郭小丽　王玉堂 (3)

策论园地

合肥市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研究

——以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例……合肥市委编办课题组(7)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杨艳梅(15)

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吴　昌(20)

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调查与思考……李进儒　于盈(24)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南京市浦口区委党校课题组(30)

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本刊合作单位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相关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发　行：《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编辑部

通信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 901 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62206629

电子信箱：xb1233@126.com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674-500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4-1249/Z

学思札记

列宁对经济主义思潮的批判及其方法

——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为中心的考察……尚英萌　孙迪亮(33)

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1922-1927)……王　淇(41)

信息荟萃

“科创合肥”等六则……(49)

坚持底线思维：中国共产党的制胜之道

郭小丽　王玉堂

（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底线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底线思维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战略策略，也是重要的领导艺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应变局、化危局、解困局、开新局，不断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智慧。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一个重大课题，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全局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加强理论武装、发扬斗争精神。

[关键词]思维方法　底线思维　底线思维能力　忧患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1]180-18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底线”“底线思维”“底线思维能力”等词汇也随之经常出现在党的文献中。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底线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底线思维是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战略策略，也是重要的领导艺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应变局、化危局、解困局、开新局，不断创造历史伟业的重要智慧。坚持底线思维，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是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一个重大课题。

一、底线、底线思维与底线思维能力

底线，在《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最低的条件；最低的限度。”[2]245 简而言之，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事物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从哲学意义上说，一个事物之所以成为这个事物，有其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但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一旦突破一个事物成其为这个事物的限度，事物就会发生质的变化，这个事物就不再是先前那个事物了，而是变成了其他的事物。这个限度就是“底线”。无论为人、做事还是为官从政，都有各自必须坚守的底线；一旦底线失守，就会造成严重甚至是难以承受的后果。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希望事物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但事物的发展变化既受其内在规律的支配，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发展变化的结果可能符合人们的预期，也可能不符合甚至与人们的预期相反。这就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底线思维是以底线为导向的一种思维方法，是一种先知先觉的超前型思维，也就是

收稿日期：2022-09-05

作者简介：郭小丽，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馆员。王玉堂，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山东大学领导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合作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

在事物发展变化的结果还没有确定之前，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和潜在可能性提前作出判断。底线思维是一种趋利避害的主动型思维，坚持底线思维就是“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3]784，“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4]500，努力“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3]784，也就是善于在探“底”中攀“高”、在避害中趋利、在忧思中奋起。底线思维是一种直面现实的进取型思维，坚持底线思维的核心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分析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对策[5]。底线思维不仅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而且蕴含着适用于每一个平常人的深刻哲理。

坚持底线思维的成效最终是以底线思维能力来作支撑的。底线思维能力，就是客观地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积极的思维能力[1]180，就是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

二、坚持底线思维是党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郑重指出：“全党必须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常怀远虑、居安思危。”[6]“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中：“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是人类重要的生存智慧，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才能在前进道路上于安思危、于治忧乱、永不懈怠，才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古希腊传说中的“达摩克利斯剑”就是忧患意识的物化。坚持底线思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演进和斗争实践中，形成了“忧生乐死，忧兴逸亡”的思维认知、“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易经·系辞下》）的思维自觉和“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六十四章）的治理智慧，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肥土沃壤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高度重视底线思维、也善于进行底线思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腥风血雨的革命战争年代到艰辛探索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风险挑战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奋斗培养了中国共产党人“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思维惯性，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进取品格和危中求机、险中取胜的斗争智慧；《义勇军进行曲》中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熔铸在中国共产党人血脉里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催生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始终是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所遵循的一个重大原则。毛泽东同志是坚持底线思维的典范，他早就说过，“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7]362，并告诫全党：“许多事情是意料不到的，但是一定要想到，尤其是我们的高级负责干部要有这种精神准备，准备对付非常的困难，对付非常的不利情况。”[7]392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8]1438-1439。这一告诫，饱含哲理，充满忧思，至今言犹在耳，既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治乱规律的深刻洞察，更是对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实现长治久安的真情期待。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要求全党“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9]267。随着时代的发展，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10]574-575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11]65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科学判断，反复告诫全党，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12]219，“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12]531。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伟大征程上，必须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时时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居安思危的忧患、见叶知秋的敏锐，以“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8]1233的战略自觉，下好防范风险、化解矛盾的先手棋，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主动仗，亦如美国学者卡耐基所言，善于“预见困难，并在它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样才能“在困难发生之时得到一份难得的平静”[13]307–308。

三、综合施策，不断提高底线思维能力

底线思维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思维能力。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综合施策，从多个方面着力。

（一）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必须坚定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4]130底线思维源于对理想信念和初心使命的坚守。理想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撑，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站稳脚跟，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才有战胜困难、应对挑战的勇气、信心和力量，推动事业发展才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创造力，进行底线思维才有意义和价值。理想信念是具体的、实践的。要把理想信念的坚定升华为进行底线思维的能力和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造福的行动，坚定不移守住发生风险的底线，勇于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挑战。要守住政治底线，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心怀国之大者，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守住道德底线，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守对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己的品德；守住法治底线，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自觉依法用权、依法办事；守住廉洁底线，知敬畏、存戒惧、守法度，自觉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

（二）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必须增强全局意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15]90，“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16]149，“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16]221。“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清·陈澹然：《寤言·迁都建藩议》）底线思维是一种全局思维。底线是全局中的底线，全局是必须守住底线的全局，守底线是为了保全局；一旦全局底线失守，就会犯下系统性、颠覆性错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这是我一直强调底线思维的根本含义”[14]16，道理即在于此。领导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少数”，必须增强全局意识，坚持系统观念，树立世界眼光，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善于从纷繁表象中发现事物内在的联系与逻辑，以此作为考虑问题、谋划工作的基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场总体战，要坚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善于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具体利益和根本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明辨利害，权衡得失，顾全大局，慎重抉择，决不能只顾一时一事、一局一域而影响长远、危及根本、损害全局。

（三）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必须增强忧患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接近目标，越需要全党同志增强信心、勠力同心，保持忧患意识、增强斗争精神，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14]20他还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14]6–7心存忧患，才能有备无患；处盛虑衰，才能长盛不衰。古人说“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则终不乱”（《宋史·宋祁传·直言书》），就是这个道理。底线思维其实是一种忧患思维，其核心价值指向是忧患意识。以底线思维防范风险，以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做好应对极端情况的准备，这是提高底线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同志却在大会作结论报告时出乎意料地要求全党要“准备吃亏”，并接着讲到当时的“困难有十七条”[7]387，这里体现的就是忧患意识，堪称底线思维的经典案例。“天下之事，常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明·方孝孺：《指喻》）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就是要善于审时度势、谋

局察势,善于从风平浪静中发现涌动的暗流,从细微的边际变化中洞察事物发展的态势，从历史对比中掌握风险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及时做好预警、预案、预控,保持战略主动,努力做到“远见于未萌、避危于无形”(西汉·司马相如:《上书谏猎》),不断提高风险防控的能力、水平和实效。

(四)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必须加强理论武装

理论武装“是提高干部、改进工作的根本方法”[17]122。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16]212,“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8]1516，因此,“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16]111。思想就是力量,理论指引方向。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加强理论武装就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用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攻坚克难、应对挑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必须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恩格斯说:“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18]467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底线思维，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最大限度把风险化解在源头,让风险挑战在“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中除隐患、化危局,从而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五)提高底线思维能力,必须发扬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9]415忧患使人警醒,斗争决定成败。斗争精神是底线思维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战胜困难挑战,赢得主动和胜利。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面对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不仅要忧到点子上,忧在关键处,知道底线和风险是什么、在哪里,更要有迎难而上的勇气和担当,对触及底线的行为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实践证明,在重大风险面前,主动迎战才有生路、敢于斗争才能成功。相反,“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6]。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12]226共产党人的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式,但从根本上说,都是迎着困难、奔着问题、应对挑战去的[20];斗争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更好地坚持底线思维、战胜风险挑战,从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实现更高质量、更为安全的发展。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21]“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充满风险与挑战的世界，风险防控与治理无疑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吴兢:《贞观政要卷二·直谏(附)》)在这样一个“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必须更加注重底线思维,更加注重提高底线思维能力,时时“虑之于未有”,事事“图之于未萌”,尽可能把困难和挑战估计得更充分、更严峻一些,把解决问题的措施考虑得更具体、更周全一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扎实、更稳妥一些，力争不出现重大风险或在出现重大风险时扛得住、过得去,确保在风险可控范围内实现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4.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下转第14页)

合肥市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研究

——以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例

合肥市委编办课题组

[摘要]当前部分乡镇利用区位优势,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逐步成长为产业基础雄厚、经济动能强劲、人口规模庞大的经济发达镇,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加快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支撑。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乡镇体制的一次系统性重大结构变革和功能变革,对提升乡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2021年,安徽省委编办全面推开经济发达镇改革,在全省选取了81个镇作为经济发达镇改革试点,合肥市肥东县长临河镇等8个镇入选。本文以经济发达镇改革的政策背景、改革举措、发展现状为切入点,剖析改革范式、治理效度和政策梗阻,进而提出优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关键词]经济发达镇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分类分层模式

合肥聚力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是全面落实市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257”奋斗目标的应有之义。2020年12月,安徽省委编办认定合肥市岗集镇、花岗镇等8个乡镇为省经济发达镇。经过近两年的改革探索,合肥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分类分层”在地化镇改模式,即在体制改革中,综合考虑影响乡镇发展的异同因素、发展阶段和发展定位,相机给予靶向赋权和闭环监管,牵连带动系统性结构变革和功能变革,逐步形成镇域简约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通过“分类分层镇改”,显著提升了经济发达镇连接县城、服务乡村作用,增强了其对周边乡镇的辐射带动能力,促进了镇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

一、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背景

2010年4月,经中央编委同意,中央编办会同中央农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13个省份25个镇作为试点(后增至15个省份29个镇),其中包括安徽省2个镇(无为县高沟镇、天长市秦栏镇)。各地也纷纷以省级试点的方式,扩大试点范围,如安徽省选择了8个镇作为省级试点,其中,合肥市长丰县下塘镇、肥西县花岗镇分别于2012年、2014年获批试点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

基金项目:2022年度合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合肥市加快打造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研究——以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例”(立项编号:HFSKYY202221)。

收稿日期:2022-09-21

课题组组长:刘勇(合肥市委编办副主任);成员:程健龙、程坤鹏、刘青、黄媛、魏依玫、肖和平。

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可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研究提出深化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编办于2016年12月，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并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党的十九大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

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改革指导意见，安徽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2018年7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服务权限”“构建简约精干的组织架构”等7项重点任务，要求省委编办按照“建成区常住人口一般应达到5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公共财政收入等指标连续2年位居全省乡镇前10%以内”的标准拟订认定办法，报批后实施。据此，省委编办于2020年12月批复同意全省81个镇为经济发达镇，其中合肥市除下塘、花岗2个上一轮试点镇外，新增肥东县石塘镇和长临河镇、肥西县山南镇、长丰县岗集镇、庐江县龙桥镇、巢湖市夏阁镇等6个改革镇，总数达到8个。2021年5月，8个镇改革实施方案获批，开始正式实施。

二、合肥经济发达镇改革的成效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启动以来，合肥市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之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着力在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服务权限、优化组织架构、集中审批服务和综合行政执法等7个方面下功夫，经过1年多的时间，在建立符合经济发达镇功能定位、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服务群众能力更强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大，基层政府功能更加完善

在赋权方面，县（市）政府进一步扩大经济发达镇经济社会管理服务权限，及时调整优化经济发达镇权责清单、公共服务清单、配合事项清单，赋予与经济发达镇发展需求高度契合的权力事项，经济发达镇平均赋权清单目录达150项，初步形成了“赋权—承接—监管”的改革闭环，基层政府运行更顺畅，县镇两级职责边界更加明晰，统筹全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能力更强。调查显示，86.34%的受访者认为赋权效果显著。在审批服务方面，建立“线上+线下”“前台+后台”模式，整合公共服务和行政审批职责，搭建综合、便民、高效的政务服务平台，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理”。高标准推进为民服务中心建设，按照应进尽进原则，将医保、民政、卫生健康等相对集中的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纳入为民服务中心办理。经济发达镇根据自身实际，综合设置的7—12个窗口高效运行。2021年以来，8个经济发达镇政务服务平台、为民服务中心办件量在所在县（市）排名超前，群众满意度较高。调查显示，69.38%的受访者认为效能建设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效果明显。在综合执法方面，优化镇内资源，组建综合执法队伍，行使安全生产、城市管理、文化旅游等领域赋予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权，市场监管等领域为联合执法。新组建综合执法队，承担一线日常执法巡查和现场监管执法职能，从源头上解决了执法缺位、多层执法、多头执法等问题，政府执法和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

（二）组织架构扁平高效，人员编制使用更加灵活

在机构设置方面，进一步整合审批、服务、执法等方面职能，经济发达镇机构实行综合设置、限额管理、名称统一，形成“8+2”模式，即8个必设机构、2个自主设置机构，机构设置从“窄职能、多机构、交叉多”过渡到“大职能、少机构、推诿少”，由50多个精简为10个综合性机构，精简率达80%。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党群综合、经济发展、综合治理、综合执法、为民服务五个工作平台，内部行政层级高度扁平化，行政运行机制更加顺畅。比如，肥东十八联圩生态湿地蓄洪区在经历2016年和2020年洪灾后，面临5个村落近万人集体搬迁安置难题，长临河镇将农、林、水、规划等多部门整合为规划建设办公室后，对安置人员、可用空间等进行精准测算，有效避免了沟通时间长、统计口径不一等问题。在派驻机构管理方面，接受经济发达镇党委统一指导和协调，日常管理、工作考核以镇党委为主，干部任免和调动听取镇党委和政府意见，

派驻机构与镇设置机构协同配合、运行顺畅。调查显示,72.03%的受访者认为派驻机构和镇上机构协同配合度“很好”。在人员编制使用方面,实行编制分类管理,在行政、事业人员身份不变的前提下,按照“人岗相适、人事相宜”的原则,优化配置基层人力资源。镇党委加大对工作实绩突出、表现优异人员的提拔任用力度,组织部门选派优秀干部到镇锻炼,形成了领导班子强、干部队伍活、办事效率高的良好局面。

(三)政策支撑保障到位,基层发展动能更加强劲

加大财政、土地、人事等方面改革支持力度,专项给予经济发达镇更优先的资格、更大的倾斜和更强的保障。在财政管理方面,明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了县财政分成办法及财政管理体制,经济发达镇超财政收入基数部分全额返还,在专项债券发行上予以倾斜,充分调动了乡镇在培育税源、发展经济上的积极性。在金融服务体系完善方面,聚焦市场重大需求,立足产业发展基础,鼓励金融机构在经济发达镇设立分支机构、村镇银行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落实国家对新设和引进金融机构奖励政策,各镇在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性费用补贴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经济活力明显增强。在项目建设方面,乡镇重点产业、社会事业和基建项目优先被纳入省市重点项目库,建立项目推进专班,统筹推进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庐江化工园、比亚迪等一些示范区、产业园、大项目。调查显示,78.63%受访者认为改革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效率有较大提升。在建设用地管理方面,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市(县)政府在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中优先安排一定数量保障经济发达镇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优化了经济发达镇布局和形态,推动了经济发达镇与周边乡镇、村协同发展。夏阁镇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成效较好。

(四)党建引领带动发展,基层治理效能更加显著

在强化党建引领方面,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在镇级层面,完善运行工作机制,充分发挥镇党委班子在经济发达镇“五个工作平台”建设方面的统筹抓总作用。在村(社区)层面,强化村级党组织建设,全面推行“一网统管”,按照50~100户划分网格,配备专职网格员,全面掌握网格动态。推动非公党建,设置党建联络站,非公企业党组织书记的桥梁作用发挥明显。石塘镇、花岗镇党委及社区党组织与驻沪党委结对共建,引导驻沪企业在乡投资,引导产业转移回乡布局。在创新基层治理方面,新组建社会治理中心,联合司法所、派出所等机构,以党建引领网格治理,探索建立基于具体事项权责的跨层级处置响应机制,将基层网格与综合政务平台无缝对接。在加强法治保障方面,村(居)民委员会、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等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开展换届工作,推广村级组织依法自治事项清单,完善村级重要事项、重大问题经村党组织研究讨论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基本健全。党建调查显示,81.5%的受访者认为改革后党建工作有明显提升,79.74%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协同治理水平提升显著。

鉴于8个经济发达镇中只有下塘、花岗为上轮经济发达镇试点,其他6个镇批复时间不长,以下塘、花岗这2个镇为例,对其批复前后财政收入数据以及全县情况进行标准化比较分析,可得出从2017年开始,两个试点镇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县域增长速度,这一方面说明经济发达镇改革起到了作用,同时也说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效果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

三、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与经济发展要求还不相适应

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排头兵以及地方实体经济的增长极,经济发达镇相较传统乡镇来说,人口集聚、经济规模大,传统的权责配置、组织架构、运行方式等难以适应快速城市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管理服务需要。特别是在职能转变方面,经济发达镇既要承担传统乡镇所需履行的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为民服务、实施综合管理、维护平安稳定、统筹城乡建设、指导基层自治等职能,还要比照开发园区管理机构,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首要任务,着力强化经济管理和投资服务等职能。从合肥市8个经济发达镇来看,在赋权、用权、控权上还有许多文章要做。比如,赋予乡镇在产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的行政事

项,最多达到279项,但部分下放事项在镇级层面行使机会不多。有的镇反映,该镇这次赋权中有大型户外广告牌审批设立权限,但实际上由于镇内没有高速道路,不存在大型广告牌,赋的权力也没有监管对象。

(二)机构整合和工作机制要求还不相适应

这次改革对经济发达镇的机构进行了“瘦身健身”,但从调研情况来看,还有不少地方存在“新机构老样式”的情况,即虽然人员岗位“物理整合”了,但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事,没有产生“化学反应”。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县级部门向镇里下派工作时没有沟通协调好,工作任务在镇里分解到相关部门后,往往只由一名专职或兼职人员承担,其他人员插不上手,还未形成常态化岗位交流机制;另一方面,一些新整合的部门领导还处于业务学习阶段,尚未开展流程再造和功能重塑,有些镇受场地限制,办公地点还未能相对集中。同时,本次改革未涉及派驻机构整合,调研中发现,目前设在乡镇的自规所(分局)是由过去的国土所(分局)调整设立,但市级和县级将规划职能划入自规局后,乡镇层面并没有将规划职能和相关人员划入自规所,依然是放在建设发展部门,导致自规所(分局)同县自规局职责不对应,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现问题。此外,“五大平台”作用发挥还不明显,本次改革中要求试点镇建立党群综合平台、经济发展平台、综合治理平台、综合执法平台、为民服务平台5大平台,但目前相关工作机制流程还未建立健全。

(三)公共服务与群众公共需求还不相适应

一些经济发达镇的规划定位不明,规划建设水平不高,规划的科学性、全面性、严肃性不够,缺少细化举措,难以有效指导产业发展和镇域发展。为民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调研中发现,有的镇为民服务大厅设置的窗口可以“一窗通办”,但大多数依然是“分灶吃饭”,主要是因为虽然很多业务办理都已纳入安徽政务服务网,但也有一些存在接入问题,需要“跳转”到专门的系统办理。管理能力跟不上,一些公共服务事项下放后,缺少相关专业人员,市级和县级的业务培训也未能完全跟上。同时,由于经济发达镇管辖范围大,城管领域很多违法违规行为存在发现难、违法成本低等问题,管理难度较大。网格员作用发挥相对有限,本次改革中不少镇推行了“多网合一”,网格员相对过去工作量更大,而且网格员还存在年龄大、专业素质不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弱等问题,一些新开发的“随手拍”等App系统普及难度较大。

(四)政府财力与承担事权责任还不相适应

目前虽然各县都出台了扶持经济发达镇的财税分成和财政返还政策,但庐江县和巢湖市的财政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以县级层面“切蛋糕”缓解经济发达镇资金缺口的作用比较有限,也容易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

(五)政府执法体制与执法诉求还不相适应

除下塘、花岗2个前期试点镇获得省政府下放的综合行政处罚权外,其余经济发达镇均未获得综合行政处罚权,必须通过县级相关主管部门下达处罚决定书,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问题。而且,调研发现,镇级行政执法中,约70%以上采用说服教育方式解决,20%为责令改正,只有少数案例进入正式的行政处罚程序。同时,不少经济发达镇持执法证或执法辅助证人员偏少,也对执法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进一步深化经济发达镇改革的思考

到2035年,合肥市城乡融合发展将逐渐走向成熟期,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将释放出巨大的投资空间、市场空间、消费空间,区域格局、城乡格局、产业格局将得到重塑。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合肥都市圈等战略的实施,合肥左右逢源的区位优势将更加凸显,农业转移人口回流、向省会城市集聚的趋势将进一步显现。特别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将更有利于合肥承接先发地区的产业和功能。经济发达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载体,在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链建设等方面的大协作、大配套、大融合中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城市人才、工商资本及金融资本到经济发达镇投资发展将成为常态,城市居民到镇消费趋于普遍,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势将更加明显。深化经济发达镇改革,应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新发展理念,找准地区发展优势,坚定不移破解制约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做优产业集群,增强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等功能。

按照安徽省新型城镇化规划，特色小镇主要分为三类，即先进制造类、现代服务类、三产融合类。目前8个经济发达镇在建成区常住人口、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公共财政收入等指标上没有太大的区分度，但实际上，对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细分发现，这8个乡镇内部已经产生了分化。随着乡镇差异性的扩大，单一化的赋权增能及碎片化的机制调整可能无法应对镇域治理的复杂情况。要提升经济发达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支撑，强化其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深化经济发达镇改革，必须在总体上坚持和推进“分类分层”在地化的镇改模式——在分类维度上，区分爆发型工业强镇、迸发型特色强镇、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在分层维度上，区分高增长型强镇、发展型强镇、稳健型强镇，根据两个维度精准定位每一个试点镇发展坐标（见表1），明确改革镇未来的发展定位和产业选择，并在动态赋权、机构调整、职能优化、编制调配、条块协同、要素配对等方面进行靶向调适，带动系统性重大结构变革和功能变革，进而全面激发简约高效管理体制对经济发达镇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最终在整体治理层面形成契合合肥未来城乡融合发展的“分类分层”在地化镇改模式。

表1 合肥经济发达镇改革：“分类分层”在地化模式

分类/分层	爆发型工业强镇	迸发型特色强镇	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
高增长型强镇	下塘镇	长临河镇	石塘镇
发展型强镇	岗集镇	/	龙桥镇/夏阁镇
稳健型强镇	花岗镇	/	山南镇

（一）总体思路：坚持“分类分层”在地化镇改

1.下塘镇：爆发型工业强镇+高增长型强镇

下塘镇近两年发展异常迅猛，2021年，实现规上工业产值76亿元、同比增长19.87%；固定资产投资58.9亿元、同比增长57.91%；招商引资到位资金40亿元、同比增长25%；财政收入5亿元、同比增长19.3%，主要经济指标均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下塘工业园区远景规划面积60平方公里，其中产业新城合作区18.4平方公里，产业发展区为15平方公里。园区入驻企业近200家，其中规上企业36家，比亚迪、中创新航、双杰电气、合美科技等重大项目先后落户，正在向“千亿强镇”进发。从下塘相关指标和实地调研情况来看，可以判断其具备爆发型工业强镇和高增长型强镇双重特性，该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未来3~5年的发展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镇域规划、人口管理、市政管理、综合执法、园区管理等方面的难题，对全镇统筹能力、条块协调、部门管理服务、镇村关系等都是较大的挑战。

2.岗集镇：爆发型工业强镇+发展型强镇

岗集镇位于合肥主城区西北方，距合肥市区5公里、新桥机场15公里。2021年，完成财政收入10.02亿元，同比增长17.9%，综合实力位列中部百强镇第30位、全国千强镇第332位。规上企业126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达83亿元，同比增长16.4%；服务业营收14亿元，同比增长7.5%；社消零总额19.5亿元，同比增长14.2%。产值超亿元企业25家，税收超千万企业15家。新增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7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家。现有国家高新企业4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家，市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5家。近年来，岗集镇先后被批准为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安徽省产业集群专业镇、安徽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安徽省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基地）。岗集镇各项发展指标较为均衡，由于靠近主城区及交通便利等因素成为省市重点产业项目布局的重要承载镇，具备爆发型工业强镇和发展型强镇特征，其工业化发展基础雄厚，产业升级后劲十足，其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未来发展战略进行谋划布局，重点要强化经济发展部门、规划建设部门的职能重构，发挥规划建设、招商引资、项目审批、要素保障等对经济的支撑作用，强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为民服务集成在改进公共管理或服务中的作用，真正实现制度供给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3.花岗镇：爆发型工业强镇+稳健型强镇

花岗镇2021年财政收入完成2.52亿元，招商方面引入项目15个，协议总投资32.90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0亿元，全年规上工业累计产值27.12亿元，增速23.7%。此外，完成了合安高铁及合九货运联络线、合六南通道、垃圾焚烧发电等一大批国家、省、市级重大项目征迁，累计拆迁面积约288.6万平方米。该镇经济发展迅速，具有靠近主城区区位优势，特别是在产城融合发展方面极具特色，已经成为肥西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主战场，在辐射带动周边区域乡镇、服务保

障重大产业项目等方面的作用显著。该镇具备爆发型工业强镇和稳健型强镇的双重特性,其赋权、机构调整、人员配置要结合城镇规划、产业项目保障、产城融合发展、征迁安置等重点工作进行优化。

4.长临河镇:迸发型特色强镇+高增长型强镇

长临河镇 2022 年 1—5 月完成税收 1.32 亿元,同比增长 200%以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9 亿元,同比增长 31.1%,投资 1000 万元以上重点项目达 42 个,城镇化率高达 72%,先后获评“中国乡村振兴示范镇”“安徽省特色旅游名镇”,正全面打造“环湖首镇、生态慢城、文旅名镇、科创新城”。该镇主打生态文旅,特设文旅旅游服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办公室,多方争取 22.4 亿元资金用于建设环巢湖生态文明示范区,其总体规划获评“全国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因此,该镇属于典型的迸发型文旅特色强镇,且其差异化发展潜力巨大,符合高增长型预期。与此相关的城镇管理赋权、文旅公共服务、规划设计、生态环境保护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建设用地、文旅产业项目、专项资金等要素应及时保障。

5.石塘镇: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高增长型强镇

石塘镇 2021 年财政收入 3 亿元,其中可支配财力 1.55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9.25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2 亿元,商贸业企业限上零售额完成 0.43 亿元,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完成 4.15 亿元,现有市场主体 3337 家。石塘镇地理区位比较特殊,合芜高速、合宁高速、宁西铁路穿镇而过,且合宁、合芜高速均在该镇设有出入口,该镇全力打造的合肥现代智慧物流园已纳入《合肥市“十四五”现代物流业发展规划》,成为全市一个重要的物流节点。此外,其浮槎山文旅开发、石长路工业带、合上产业园等重大项目也在陆续推进。该镇综合实力在肥东县二类乡镇中处于领先地位,工业特别是建筑业实力雄厚,属于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且其善于利用交通优势,谋划吸引商贸物流、文旅开发、工业项目等,具备较好的增长潜力。在后续改革中,要注意规划建设、项目招引、要素保障、拆迁安置、综合执法等方面发力分散、缺乏统筹等问题。

6.龙桥镇/夏阁镇: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发展型强镇

龙桥镇 2021 年财政收入为 0.57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46.3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13 亿元,商贸业企业限上零售额完成 1452 万元,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完成 2419.4 万元。该镇与夏阁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均极为相似,同属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园区企业产值较高,但受“提级管辖”因素的影响,园区对镇区的反哺作用尚不明显。除规上工业以外,其他指标均表现平平,镇区城镇化率、人员编制数量、机构设置、赋权结构等并未呈现一定的特殊性,改制要补齐农业发展、乡村振兴、公共服务等短板,强化并释放园区管理、项目审批、财税支撑等层面的改革红利。

夏阁镇 2021 年全镇财政收入为 1.27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完成 40.73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7.01 亿元,商贸业企业限上零售额完成 260 万元,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完成 7600 万。夏阁镇城镇化率只有 12.81%,但规上工业十分发达,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40%,正聚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镁基合金新材料产业基地”“大交通轻量化产业基地”,其所辖的明巢高速夏阁枢纽互通是巢湖境内最大的高速公路枢纽互通。结合城镇化发展指标,该镇也属于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但发展不够均衡,商贸、服务业发展滞后,行政体制改革在服务夏阁园区发展、重点企业、城镇基础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乡村振兴等方面还要多出亮点、多作贡献。

7.山南镇: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稳健型强镇

山南镇 2021 年财政收入完成 0.48 亿元,引进招商 6 个,协议总投资 39.44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11.8 亿元,全年规上工业累计产值 3.58 亿元,增速 29.71%。山南镇正全力推进安置点建设项目,累计拆迁面积约 9.1 万平方米,该镇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为契机,全面推进小井庄改革强村产业园、小井庄新村提升、长庄民宿、“三庄联动”等建设。产业项目的快速推进,进一步激发了经济发达镇发展的内生动力,初步发挥了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山南镇不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自然演进型节点强镇,在非典型乡镇中具备一定的发展优势,特别是在农业种养项目、以农业为基础的三产融合发展

项目、乡村文旅项目等。下一步，其农业农村办、文旅服务中心、经济发展办、为民服务中心及相关赋权、职能整合、编制倾斜、业务流程优化等应予以加强。

（二）改革统筹：加强顶层牵引

1.进一步完善领导工作机制。从近年来改革推进情况来看，省、市、县编制部门主导推动还不够有力有效，机构编制部门作为条线部门在常态化工作中，发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催化剂”的作用不明显，同时机构编制因“刚性约束”带来的政策“滞后性”是与生俱来的，只有发挥市、县改革工作小组和党委政府的主导作用，做到上下联动、各司其职，在合理划分县、镇两级之间的财权、事权和人事权基础上，着力解决赋权赋能、配套政策落实等重点问题，才能让“独角戏”变成“大合唱”。

2.建立分层分类管理机制。2020 年全省已确定 81 个经济发达镇，一味追求要素资源集中不利于当地县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可按照“控制总量、优化存量”的原则，依据各镇的分层和分类维度，全面落实“一镇一策”，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提高要素资源配置的利用效率，推动改革政策平稳落地和改革工作持续健康发展。

（三）动态赋权：增强赋能精准性

1.精准放权解决乡镇“权小责大”难题。适应职能转变需要，根据各镇实际需求实行差异化赋权。建立“一镇一单”目录，在省、市制定的赋权目录范围内，按照“实际需要、宜放则放”的原则，加大放权力度，同时放权赋权不能一放了之，应设立培育承接能力的“过渡期”，组织放权赋权部门对经济发达镇进行指导培训，进一步明确职责、厘清权力界限、规范权力流程，做到“成熟一批，下放一批”，杜绝权力交接的“真空期”，切实提高承接能力。例如，对高增长的爆发型强镇，需要及时给予工业发展方面的权限，而对于发展水平较缓慢的自然演进镇，则需慎重放权。

2.统筹协调化解乡镇执法难题。依托经济发达镇综合执法平台，增强对条块执法力量的统筹能力，健全乡镇执法力量与县直职能部门（含派驻机构）之间联合执法、并案审查、司法移送等制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部门协同”的综合执法新格局。同时进一步推进执法规范化，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按照赋权清单明确执法依据、裁量基准、执法程序和监督途径，厘清执法边界，提升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和专业素养，拧紧依法履职的责任链条。

（四）机制调适：提升条块适配性

1.探索“岗编分离”新模式。依托综合执法平台和为民服务平台，进一步整合自规、财政、市监、公安、司法等部门的资源，赋予经济发达镇一定的人事管理权限，在编制和人事关系不变的基础上，实行“镇级属地管理，上级业务指导”，将县级派驻经济发达镇机构的部分管理和考核权限下放到乡镇，同时让部分县级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下沉到基层一线，充实经济发达镇人才队伍。

2.打造基层政务服务新格局。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通过强化“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和“全程代办”等，积极推进政务服务“去中心化”改革，打造以智慧化的镇级行政服务中心为核心，配套多个基层办事网点的政务服务体系，可考虑将为民服务中心与购物中心、大型超市、农贸市场、银行（支行）网点等设在一起，同时根据企业、群众的需要提供定制服务，量身定制“一对一”的全流程报批审批图，从项目洽谈签约环节开始提供代办支持，按照“并线”陪跑的方式，收集问题清单，精准破解审批环节的“难点”和“堵点”。

3.建立任务分流新机制。基层治理的平台化转型包括模块化和集成化。一方面，数字化平台通过模块调适重构机制实现服务集成、部门嵌入协调机制实现资源集成、过程动态反馈机制实现信息集成，进而提高基层组织的信息获取能力和协调能力；另一方面，组织化平台通过任务灵活分流机制实现事责集成、人员统筹使用机制实现人员集成、激励差异配置机制实现压力集成，从而突破政府管理平台惯常视角，为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化转型和基层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提供新的改革路径。

（五）动能集成：强化要素支撑

1.设立省级经济发达镇发展专项基金。强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投入保障，加强与市县的联动，重点扶持经济发达镇特色产业、战新产业、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新型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数字乡村建设等，进一步健全各级基金投入保障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保障、金融倾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资机制，立足产业体系“专而精、新而活”，功

能形态“聚而融、小而美”,将创新性供给与个性化需求有效衔接，打造创业创新发展平台和新型城镇化重要的载体。

2.增强规划设计的前瞻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业态,控制镇域开发强度,提高建成区管理维护保障水平,加强城镇化宏观管理,完善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发展规划等各类专项规划,落实“多规合一”。树立新发展理念的同时,既要保障现阶段发展实际需求，也要为未来发展预留充足空间,要科学优化城镇布局和形态,推动经济发达镇与周边地区协同发展，为经济发达镇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标准规划支撑。

3.强化“全科人才”的培养。条块结构使得基层政府需要遵循“上下对口”原则,按照改革前过度专业化分工的部门设置必然导致部门间 “忙闲不均”现象。可以采用“大部制+平台”的方式,通过任务的灵活分流实现工作任务动态平衡。同时为了提高基层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可采取多种方式对基层工作人员进行全方位全领域培训，制定系统的培训计划,做到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不断强化基层人员的服务理念，提升政策水平及业务能力,实现“专科医生”向“全科医生”的转变。

责任编辑:徐书琴

(上接第 6 页)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2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5]王玉堂,王芮.深刻把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中的方法论[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1(3):44-50.

[6]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7]毛泽东文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选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江泽民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胡锦涛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1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3][美] 戴尔·卡耐基. 人性的弱点全集[M].过夫,编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防范风险挑战、应对突发事件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15]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6]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 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0]王玉堂,周明珠.发扬斗争精神 增强斗争本领——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11):10-13.

[21]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建会 70 周年大会暨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上的致辞[N].人民日报,2022-05-19.

责任编辑:马俊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对策建议

——以北京市J社区为例

杨艳梅

（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北京 100193）

[摘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区治理是最基础和最重要的环节。社区治理通过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动力，以达到社区民主有序、和谐稳定的目标。目前，基层社区不断创新治理实践，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本文以北京市J社区为例，梳理了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共治的实践经验，并结合实际反思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对持续推进社区治理多元化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党建引领 社区治理 共建共治 精准治理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基础。新时代，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是群众安居乐业、基层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新形势下，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更加注重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有效吸引多元主体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之中。

一、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必要性

（一）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内在要求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最坚实的力量支撑来自基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基层党建工作，强调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红线。而社区作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今天城镇化背景下的新型社区，存在着多元的社会主体，既是党执政基础的重要平台，也是社区发展的重要支撑点[1]。因此，整合区域力量，构建社区多元共治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的内在要求。

（二）贯彻落实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强调“城乡社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要“积极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再次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并要求“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

收稿日期：2022-09-21

作者简介：杨艳梅，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党校科研部主任。

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因此,探索新时代下社区多元治理的机制和路径,是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破解社区治理困境的现实要求

当下社区治理面临着诸多难题,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社区党组织能力不强、社区人心涣散、居民满意度不高。以北京市J社区为例,2012年前,由于开发商遗留问题以及业委会换届问题,社区矛盾重重。例如,社区部分公共配套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尤其是电梯故障频发、监控系统设备老化等;社区居民人心涣散,内生动力不足,对于社区安全隐患关注度较低,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意识与能力都有待提升。因此,提升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唤醒居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探索社区民主协商议事机制,就成了社区工作的重中之重。

二、北京市J社区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共治的实践探索

J社区建成于2001年,是典型的商品楼小区,现有常住居民869户,总人口数2938人。从2012年起,J社区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为核心,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方向,调动社区多元主体积极性,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社区治理成效显著。

(一)自创“社区轮席值日”项目,优化居民自治广纳社情民意

为增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监督和参与力度,J社区自创“社区自治·轮席值日”志愿服务项目,并提炼“8+1”社区工作法,动员和号召社区每位居民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自治。

一是建立管理和宣传相关制度,促使服务项目深入民心。社区轮席值日是以每栋楼各单元门为单位,号召居民以户为单位参与轮席值日,深入居民中广泛征集问题和建议并记录在册。为保障项目落地,社区党总支结合社区实际,研究制定了《J社区民主自治——“我是主人翁”轮席值日生管理制度》,将轮席值日的目的、意义、职责和例会制度、检查制度、奖励制度等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在《J社区报》上设置“社区自治·轮席值日”志愿服务项目专栏,定期刊载轮席值日开展情况,并组织工作人员发放到每家每户。另外,还精心设计和制作了宣传画、展板和《值日生日记本》,将宣传画张贴在每栋楼的宣传栏内,把展板固定悬挂在每一楼层的电梯对面,将《值日生日记本》发放至每户居民手中,对居民开展长期宣传,促使轮席值日项目深入民心。

二是提炼“8+1”社区工作法,推动居民真正参与其中。社区党总支创新“8+1”工作法,构建“轮值、记录、走访、建账、巡查、议事、公示、做事”八步工作流程以及一个监督机制,形成良性闭环。(1)“每月轮值”。把每栋楼的每个家庭从01编号,每月以一户家庭作为志愿者进行依序轮值。每月月初,每一层楼道张贴公示当月轮值家庭的房间序号。(2)随手记录。设计制作《值日生日记本》,每月轮值家庭将发现的问题和需求随手记录在本上。(3)入户走访。每栋楼招募4名骨干居民志愿者,协同社区党总支、社区居委会和服务站工作人员,以发放和回收《值日生日记本》为媒介,定期入户走访,当面听取居民意见。(4)建立台账。社区组织志愿者每个月末对值日本所记录内容进行录入、整理和归纳,形成当月社区问题台账。(5)实地巡查。社区党总支每月定期组织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代表,骨干志愿者和居民代表一起开展实地巡查,针对问题台账逐一进行勘验核实,能够当场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6)多方议事。社区党总支联合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代表、社区民警、骨干志愿者、轮值家庭代表及社区居民代表,每月月末定时召开“社区议事协商会暨轮席值日生例会”,结合实地巡查的情况分析问题及其成因,厘清问题责任主体、讨论问题解决路径、制定问题解决的具体方案等。(7)结果公示。社区将每月形成的问题台账和议事协商会决议,包括问题清单、各责任主体对问题的回应、下一步解决路径,均通过线下和线上平台及时发布。(8)共同做事。社区议事协商会后,根据议事会讨论形成的行动计划,各责任主体按照分工,互相协作,共同行动。例如,该由物业公司跟进事项,物业公司

在承诺期限内着手处理；该由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事项，由社区居委会牵头负责落实。(9)建立监督机制。组建由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纪检委员、街道包片科室负责人、房管所代表、网格律师、社区民警、党员代表、业主和居民代表组成的“巡视组”，每半年对社区业主和居民普遍关心、关注事项进行巡视督查。在巡视后，“巡视组”会对巡视具体情况进行整理，形成书面报告进行公示，接受社区居民、业主的监督。

三是加强志愿者服务队伍建设，在居民中发挥好带头作用。社区党总支通过征集和招募志愿者的方式，共征集社区居民860余人和30多名大学生组成轮席值日志愿者队伍。项目志愿者分为骨干志愿者和普通志愿者两类，其中骨干志愿者包括社工志愿者、骨干居民志愿者(包括业委会成员)、大学生志愿者；普通志愿者包括参与每月值日的居民。社区党员和骨干志愿者负责《值日生日记本》的传递、通知值日生参会等工作，同时进行项目的宣传工作，在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带头作用。

(二)搭建“四方联席会”平台，凝聚多方力量议事解决问题

为快速解决居民诉求，J社区成立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的四方联席会，搭建“社区会客议事厅”平台，完善精准协商议事机制，多方合力解决问题。

一是组建“四方联席会”，压实四方责任。从2012年开始，J社区每月月末定期召开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和业委会在内的四方联席会，就社区的突出问题进行协商解决，推动形成社区民主协商议事的良好机制。

二是动员辖区力量，打造“4+N”多元议事主体。2019年，J社区进一步推进社区会客议事厅试点建设，优化完善社区议事协商机制，在原来四方联席会基础上吸纳更多主体，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社区民警、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等多元主体组成“4+N”社区议事协商委员会，动员更多参与主体，整合更多协作资源，挖掘更多社区资本，提高问题解决效率。社区议事厅围绕社区民需议题展开民主协商，比如电动车安全、文明养犬、停车管理等问题，经过几轮议事协商形成共同决议，居民共同参与，保证议题决议的有效执行。

三是明确“五步”循环议事程序，做到有章可循。J社区逐步规范优化问民需、汇民意、议民题、执民事和促民评“五步”循环议事程序，制定了包括《J社区会客议事厅工作制度》《“五步”循环议事程序》《“十二条”议事规则》等社区议事协商制度体系，进一步明确了健翔议事厅的参与主体、组织形式、议事模式、实体空间建设、网络空间建设；学习罗伯特议事规则，坚持“一事一议”、集体意志自由等原则，制定健翔议事规则“十二条”，并通过系列社居委管理人员和志愿者培训、模拟实操，做到有章可循且有章必循。

(三)创新“社区公益服务”模式，激发社会力量开展专业服务

J社区创新社区公益服务模式，孵化和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从自益到公益。针对社区28个社会组织资源和需求情况，社区组织开展骨干培育、能力建设、团队建设、公益参与、交流沙龙、公益资本(小额资金)投入等工作，成功孵化养犬文明劝导队、文明停放电动车服务队，定期组织文明养犬宣传活动，劝导电动车规范停放、绘制社区电动车停放风险地图等，促进公益能力成长，增添社区品牌效应，逐步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

一是构建“三社联动”和“三工协作”机制，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服务。构建“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服务机制，引进社会工作事务所专业社会工作团队，提升社区社工专业服务能力。积极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提升其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能力，充分调动社区社会组织、专业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充分调动党员特别是在职党员的积极性，构建“党工+社工+义工”三工协作服务机制。

二是创新多样化公益服务活动，满足居民文化需求。J社区联合社会各方力量，以民所需开展综合服务，促使为民服务和凝心聚力有效结合。例如，社区依托优势资源，整合各方力量，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开展“雨露园”项目，通过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雷锋志愿服务、寒暑期社会实践及课后托管等各种活动，让社区未成年人在寓教于乐、怡情益智的活动中体验文化，增强才干，促进其健康快乐地成长。同时，秉承“文化养

老、精神敬老”的理念，J社区整合各种资源，开展“银发乐活在社区”项目，组织老年人走出家门，融入社区，自助互助，发挥余热，促其自我价值得到体现，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另外，社区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公开课堂，实施社区教育计划，不断提高居民的文化素养；精心打造“社区精神”，征集评选出代表社区精神的LOGO、吉祥物、社区歌等；精心推出邻里节、新春联欢会、趣味沙龙、郊游等品牌活动，把居民们组织起来，增强社区的凝聚力。

三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社区智能化发展。近年来，J社区不断探索科技治理社区实践，利用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和通讯工具优势搭建社区沟通平台，通过社区大数据分析，实现社区问题的发现聚焦、居民需求的精确把握与社区治理行动的精准实施有机统一、互相衔接。例如，2017年以来，社区借助专业力量，充分利用网络、微信等新媒体和通讯工具的优势，通过建设社区宣传教育的“微·阵地”、开辟社区事务公开的“微·园地”、进行社区治理协调沟通的“微·议厅”、创新党员群众参与自治的“微·志愿”等内容，促使社区各组织之间以及各组织与居民之间的零距离沟通模式建立起来。社区事务公开透明，社区各组织各司其职，社区居民互助自助，推动社区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三、J社区在实践中取得的成效

经过实践，J社区逐渐形成了社区志愿服务健康发展、社区居民邻里和睦相处、社区社会组织支持配合、相关各方积极参与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社区党组织的凝聚力、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都得到了逐步提升。

(一)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得到提升

社区党组织是党执政的基础单元，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层组织，也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基层阵地。近年来，J社区不断完善社区组织体系，建立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创新实施“社区自治·轮席值日”志愿服务项目和每月组织召开“四方联席会”的实践中，重视发挥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动员和号召社区居民、物业公司、志愿者等多元力量积极参与社区共建共治，社区党组织在协同解决群众诉求等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大大提升。据我们对120户家庭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有92.5%的受访居民认识社区书记（主任），94.3%的居民知晓社区党组织开展的轮席值日活动，95.2%的居民认为社区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得到了大大提升。

(二)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得到提升

J社区通过开展协商议事、文体娱乐、志愿服务等活动，不仅加强了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更增强了他们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社区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基于社区轮席值日、四方联席、多方议事协商等社区治理实践，J社区重点解决了困扰居民多年的入口车辆拥堵、屋顶渗漏水、停车管理、小区监控以及消防设施改造等一系列问题，使社区整体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赢得了居民的广泛认可。伴随社区疑难问题的有效解决，居民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提升。居民满意了，物业缴费率提升了，物业公司也得到了切实的激励。据我们对120户家庭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居民对于社区工作的总体满意度达到96.2%，对物业服务企业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93.2%。

(三)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得到提升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只有发挥基层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优势和基础作用，才能调动社区各种力量，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共同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和效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社区自治·轮席值日”项目和“四方联席会”机制很好地发挥了居民、多方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作用，发现和切实解决了社区不少问题。同时，通过对轮席值日服务与其他渠道收集的民需和民意信息的数据分析，不仅可以看到当前居民关注的重要问题，观察到社区问题和居民诉求在月度、季度、年度的变化，还可以分析出各类问题集中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特征，从而使社区服务管理更具精准性、更加精细化。通过数字治理手段有效地提升了社区议题的确定、协商与解决的效率，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与能力需要提升

在调研中发现，J社区轮席值日与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的骨干志愿者团队多以老年人为主，存在老年人参与意愿较高但能力不强、中青年人

参与能力较强但意愿不高的问题。同时,大部分居民与志愿者表示，自己愿意参与且能够胜任形式简单、内容轻松的社区服务活动，而对于议事协商、社区微公益等需要专业知识技能、长期跟踪投入的综合性服务不感兴趣且难以胜任。

(二)社区社会组织的参与力量亟待增强

在现有社区社会组织中,文体类组织居多,公益类或共建类组织很少，他们多擅长开展自益性活动,而互益和公益活动少,亟需孵化、培育和转化更多公益型或共建型社区社会组织。同时,社区社会组织自组织性较弱,除了文体类的队伍外,团队建设与活动开展大多由社区引领和组织，缺乏志愿者骨干和居民领袖,自组织能力较弱,难以承担更多社区服务和治理事务，为此需要加大对社区达人、居民领袖和志愿者骨干的发现、培育和赋能。

(三)社区治理系统性和持续性需进一步加强

社区治理需要可持续发展，居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升、多方主体的良性互动、社区凝聚力和社区共同体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相关制度体系的构建与持续性规划，为此要继续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提升社区治理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五、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

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转变观念,着眼长远,建章立制,长抓不懈。

(一)坚持以居民为主体,继续强化社区动员

在社区层面,要不断完善和优化居民参与、志愿者服务管理的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比如制定更为完备的志愿者招募、遴选、培训、激励、考核等相关办法。一方面,要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不断优化志愿者招募遴选，优化居民志愿者的结构,扩大居民志愿者的规模。另一方面,要加强志愿者团队建设,通过培训和实践等,不断强化居民志愿者参与社区建设的能力和素质。同时,要努力创新社区活动方式。通过组建各种兴趣小组、打造特色社区文化品牌、举办社区文化艺术节等,激发居民参与热情、陶冶居民情操。在活动内容和形式的选择上要考虑社区内不同人群的需求，因人制宜,分类施策。例如,针对老年人可以采取康乐中心、老年大学、曲艺社等形式,在丰富其晚年生活的同时使其思想与时俱进,引导其发挥余热;针对上班族可以突出趣缘、业缘纽带,将其与其他居民融合在一起;针对妇女儿童可以采取亲子游戏、家庭阅读、科普讲座等活动,在欢快的时光中增长知识、助力成长。在政府层面,要进一步推动相关单位与社区的联动机制,比如家庭—学校—社区、企业—社区、群团组织—社区等。对于当前已经形成的党员社区报到、党组织社区报到、企业进社区等形式的联动,建议制定相应的政策进行约束,建立长效机制。例如,支持企事业单位建立“社区公益日”制度,鼓励自己的职工每个月回社区服务一次等,进一步加强居民与社区的联系和沟通。

(二)以创新管理方式为基础,强化社区工作者团队建设

首先,从源头抓起加强人员选拔。政府部门在对社区书记配备上要重视综合能力的要求，并通过创新岗位职责与考核激励机制，提升社区工作者参与社区工作的专业性与能动性。同时,继续发动社会力量,构建由党员骨干、居民代表、志愿者、楼门长、社区能人等组成的兼职队伍体系,积极引入律师、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师等专业人士。其次,强化学习培训。将社区工作者的培训工作纳入社区干部教育培训整体规划,以提升素质能力、拓展知识结构为着力点,以加强政治理论、社区业务知识为重点,进行全方位的培训,使之具有做社区工作的本领,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2]。再次,重视实践锻炼。发挥典型社区的示范作用,通过轮岗锻炼、外出考察、经验分享等形式,提高社区工作者的实战能力和服务水平。

(三)以项目为载体,精心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建设、开展居民互助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社区治理的专业化水平。一方面,社区党组织要加强与社会组织的联系,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并通过创建社区微公益项目等形式,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同时,不断完善激励和考核机制,带动社区社会组织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由自益性、互益性向公益性转变。另一方面,对社区内已有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通过项目化运作，积极培养其独立性、自组织性,提升其规范化水平;(下转第 64 页)

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及对策建议

吴　昌

（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浙江　杭州　311300）

[摘要]党建联盟既是基层党组织创新发展的生动体现，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它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建立在抱团发展这类实践基础之上。在实践中，因成员主体作用发挥不够有力、制度机制运行不够完善、综合效应发挥不够明显等现实因素，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为此，需从党的领导、制度机制、全面发展等方面入手，做大做强党建联盟，切实提升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成效。

[关键词]共同富裕　党建联盟　基层党建　现实困境　对策建议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奋进新征程的一项重大任务，这对新时代基层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近年来，各地不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通过组建党建联盟，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不同于以往，党建联盟的组建与运行，“既有别于整合过程中的被动吸纳，也不同于嵌入过程中的单一组织行为，它是党建引领社会组织联合而成的行动共同体”[1]。从现实环境看，无论是党自身建设，还是推进现实工作，都需要“运用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将分散和分化的社会因素联为一个整体并置于有效治理之下”[2]62。总体上看，相比于实践和经验总结，有关学理研究以及对党建联盟产生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等的研究较少。加强有关党建联盟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基层党建提质增效，更有利于推进党建联盟建设，发挥好党建联盟作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背景下党建联盟产生的内在逻辑

党建联盟是基层党建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从本质上看，党建联盟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联合”思想是高度契合的，并在党建实践中得到灵活有效的应用。

（一）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为共同富裕背景下党建联盟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运动必须在党领导下开展，必须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其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联合思想[3]60-61，深刻昭示了团结凝聚力量的客观作用。无论是作为结构的组织自身，还是组织这一行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及无产阶级运动来说都有着巨大的意义。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4]510。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断探索与实践。早在 1929 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党的组织力”概念。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重视组织建设，善于组织动员群众，发挥合力作用。党建联盟正是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用党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全域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效能提升的对策建议”（立项编号：2023N164）暨浙江省党校系统社会科学联合会规划课题“共同富裕路上的党建联盟：生成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立项编号：ND22031）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2-09-21

作者简介：吴昌，中共杭州市临安区委党校讲师。

建的强大力量把各类组织凝聚起来，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

（二）实践逻辑

近年来，各地基层党组织不断强化党组织建设，以党建为统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注重发挥不同主体力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抱团发展”模式，如各地采取的机关与镇（街道）、企业、村（社区）结合“三服务”，结成帮扶组团全覆盖；推进“强村带弱村”“东西协作”“飞地经济”行动。通过融入跨村、抱团、组团的理念，不断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基层党组织实现了从“单兵作战”到“抱团发展”的转变，大大激发了党建活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这一形式的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立足不同区域、强村弱村的实际差异，创新联合发展模式，做到靶向明确、精准施策”[5]。实践表明，抱团发展能够发挥强大合力作用，推进形成多元共赢局面。这为共同富裕背景下以党组织为核心建立党建联盟提供了有益启示和实践基础。

二、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

从各地实践看，因产业发展、地方治理、公共服务等不同需求组建而成的多类型的党建联盟，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党建联盟成员主体作用发挥还不够有力

党建联盟围绕共同的目标实现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和不同行业力量的整合，得以调动多方力量、整合各类资源，但这一优势的发挥不是自动的，而是依托于每一个成员能够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实际运行中，不同主体的作用发挥是参差不齐的，“在组织发展合作中会受到时代特征、个性特征和工作理念等方面的影响”[6]。

1.认识和定位不够清晰。一是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调研中发现，对党建联盟的性质、目标、作用等的认识，镇（街道）领导和一部分村（社区）干部了解较多，普通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了解不多、认识较浅。二是存在“定位偏低”的现象。一些村（社区）党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等加入了联盟，但对联盟作用的定位主要还是停留于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建设、活动联建。通过党建联盟推动多领域、更深层次发展的意识还不强，导致各成员在许多方面还是各干各的，单打独斗比较多。三是存在“党建弱化”的现象。一些联盟成员对党建与业务的关系把握有偏差，热衷于业务和具体的工作，认为要有大的项目、大的产业才能带动党建联盟，否则党建联盟只是“花花架子”，无法真正发挥以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作用。

2.担当作为不够突出。一是存在一定的“本位意识”。一些党员干部、党建联盟成员，认为党建联盟成立增加了工作量，影响了日常工作，因而参与联盟工作不够积极主动。即使参与也多是简单的活动，或应付考核。二是存在担当能力不足的现象。一些联盟虽然有许多的成员，看似实力强大，但由于一些成员自身基础相对薄弱，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难以承担重要工作。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一些负责单位和领导干部在推进党建联盟工作中，偏重于讲政策、谈责任、提要求、定任务，忽视成员作用发挥，深入帮助和支持联盟建设与发展的实际行动较少。

3.创新进取意识不够强烈。一是存在“等靠要”思想。调研中，一些加入联盟的成员尤其是一些经济基础和党员干部队伍力量比较薄弱的村，认为既然有大家的帮助，自身就可以“轻松点”“歇一歇”“听安排”，主动谋划、争当先进的意识与行动不足。二是数字化应用不足。由于思维认知、基础设施、路径依赖等原因[7]，借助数字化应用于党建联盟日常运作的不多，更谈不上精准服务、精密智控。三是存在一定功利意识。对于党建联盟的工作，一些成员对与自身没太大关系的参与少，导致很多时候联盟的工作变成牵头单位、核心成员或属地镇（街道）的工作，并未真正发挥出联盟“联”的优势与力量。

（二）党建联盟制度化建设与运行还不够完善

与传统基层党组织相比，党建联盟成员众多，彼此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无论是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制度、激励政策和监督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对组织行为选择及其有效性都能产生重要影响”[8]。有效协调各类关系是确保组织本身有序发展的关键，这也是当前以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亟待理顺的地方，如“合法性机制与效率机制耦合”[9]问题。

1.规章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由于缺乏科学指导以及缺少较为成熟的可供借鉴的联盟组织建设与运行经验，一些联盟对组织章程、发展规划、议事规则等的研究制定较为滞后。从调研情况来看，党建联盟中制定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规章制度的较

少,对要实现什么目标、发挥什么作用、建成什么样、各成员如何参与等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导致其实际运行还停留在基础工作层面。尽管有些制定了相关的目标和工作安排,但因缺乏长效机制和闭环管理,从组建到运行存在“先热后冷”的现象。一些党建联盟组建后几近“悄无声息”,没有高效运转起来,成员对于是否要参加联盟活动随意性较大,工作推进较难。

2.内部统筹协调存在难度。一方面,由于联盟成员在组织关系、工作时间、业务专长等方面存在差异,特别是管理模式不同,对牵头负责人的能力有很高要求。而这类基层“能人”大多身兼数职,投入到联盟的精力有限,对联盟工作的安排存在较大变数,影响了联盟的实际成效。另一方面,联盟的组建基于平等自愿原则,在制度建设和机制运行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对成员行为的约束力不够大,统筹联盟内部成员工作难度比较大。特别是“两新”组织、企业等的加入或退出可变性大,其加入联盟较少关注联盟的整体目标的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建联盟看起来“联”了,实际发挥的作用与预期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3.人员经费保障不够充分。一方面,从基层反映情况看,各个联盟缺少专业人才,各地担任联盟的负责人也有很大差别,有些虽然“挂帅”了,也是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党建联盟日常运行的资金主要靠镇(街道)拨付和部分成员提供,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明确的政策规定,也无统筹使用党建经费的政策支持,限制了联盟作用的发挥,如举办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活动就比较困难。

(三)党建联盟综合示范带动效应还不够明显

从目标上看,组建和推广党建联盟意在有效激活基层党建活力,更好地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因此,实施过程中,“要在目标指引下建构最大公约数的共识,以此统一思想、选择路径和开展行动”[10]。从实践来看,党建联盟在这方面的示范带动效应还不够明显。

1.党建联盟覆盖影响范围有限。出于地理条件、资源禀赋、人员状况等多种考虑,联盟所覆盖的范围常常仅限几个村(社区)或组织。而与其它的村(社区)、组织缺乏有效的“合作”方式和路径,联盟之外的地区难以获得较多的推动共同富裕的“福利”。从已组建的联盟情况看,工作成效有目共睹,但相比于工作的推进,对做法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推广不够。在省内及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联盟不够多、特色不够突出。

2.党建联盟精准对接需求有限。实践中,联盟在广泛发动普通党员、基层群众上还不够,许多工作还是以成员所在组织的集体行为为主。一些活动的开展看似非常火热,但受众范围有限,有些偏离了基层群众的需求,群众认可度不高。而由于缺少对基层群众需求的深入了解,一些联盟成员“空有一身才艺”,没有施展舞台,其作用发挥与实际需求之间还没有实现精准匹配。

3.党建联盟合作发展程度有限。从内部看,党建与各领域的深度融合还不够。尽管成员自身趋向于实现“全科发展”,但大部分成员间的合作主要还是集中于某一项工作、某一个产业、某一个领域,系统化、整体性推进的不多,成员在各领域的发展参差不齐。而从外部看,联盟与联盟之间以工作商讨、现场学习、打擂比武等形式的交流为主,实质性合作较少。

三、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抓基层党的建设都不可放松。共同富裕背景下,作为基层党建工作实践的重要创新,党建联盟被赋予了重要使命,需要着力解决制约其发展的现实因素,才能更好地将联盟优势转化为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

(一)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凝聚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发展力量

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一切工作的根基所在。遵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促进、共同提高”的基本原则,注重发挥党对党建联盟的领导,统筹好联盟资源、队伍等要素,才能将参与主体汇聚成推进共同富裕的整体合力。一是发挥党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作用。通过政策宣讲、党校培训、专题讲座、实地调研等形式,加强联盟成员内部交流,增强各成员的主体意识、共建共享意识,精准定位各成员在联盟中的角色及作用,让成员各尽其才、各显其能。切实加强“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理念,通过“书记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党建联盟,为各成员搭建起全力施展本领的“大舞台”。二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个性化定制“一支一案”党建责任状和结对帮扶协议,推动基层党组织建

强,确保在联盟中起到战斗堡垒作用。推动联盟内部党员干部联育和协作，着力提升党员干部七种能力,发挥党员干部在联盟中的带头示范作用。三是加大对群众和各类组织的动员。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主阵地作用,精心打造各类教育基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党建联盟的认知度和影响力，根据党建联盟发展需要引导群众和各类组织参与,更好地凝聚智慧与力量。

(二)以制度机制为牵引,推动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有序发展

制度机制是各类组织得以持久稳定、有序发展、充满活力的基础和前提。注重党建联盟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加快制定和出台相关制度及配套政策,创新完善运行机制,才能为各成员作用发挥提供保障,为联盟工作开展搭建起“四梁八柱”。一是健全制度机制。加大制度和政策研究力度,明确各类型党建联盟标准,建立并不断完善组织运行、轮值主席、议事协调、准入与退出、利益联结、经费保障、人员配置、阵地建设、督导考核等方面的制度机制,形成行业细分、统筹有力、上下贯通的党建联盟体系,确保工作开展科学、有序、高效。二是注重分类指导。坚持宏观指导和分类管理相结合,充分发挥县(市、区)级业务部门的指导和乡镇(街道)业务科室的具体作用,深化分层分类,指导联盟结合实际制定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和实施方案。构建常态化服务机制,创新服务方式和内容,及时帮助解决联盟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三是强化考核运用。树立闭环管理思维,根据各类党建联盟的不同职责定位,以“契约化”形式分类制定共性和个性责任清单,压实联盟牵头组织和成员责任。对照清单开展双向认领、双向服务，建立相应积分制,作为各类先进评比、项目落地、政策扶持等的重要参考依据,形成比学赶超氛围,推动联盟成员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以全面发展为目标,强化党建联盟引领共同富裕带动效应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必须强化党建联盟内外合作,精准对接基层群众需求,推动落实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一是科学有序推进全域覆盖。坚持“一盘棋”思想,注重片区统筹、条块集成,科学规划片区发展蓝图,因地制宜、分类组建,构建产、供、销一体化联动发展体系,防止只抓点不抓面、以点代面、顾此失彼,让每一个村(社区)都能在联盟的整体带动下获得发展。二是推进各领域全面发展。突出补短板、强优势,坚持“抱团发展、整体提升”原则,着力主推“一盟一策”“一组织一优势”“一村一品”,推动联盟成员从“单科发展”走向“全科发展”。通过培育、设计、创新等方法丰富党建联盟项目业态，找准当前与长远相结合的发力点，统筹安排各类项目，坚持资金跟着项目走、要素跟着项目走,推动形成“以大带小、以强扶弱、全链合作、多方共赢”的可持续发展局面。三是精准对接基层群众需求。坚持调研开路,找准服务突破口、结合点和共同点,以“党建联盟+”模式,提供多样化、精准化的服务,引导联盟单位、社会各方、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做好和扩大“亲密朋友圈”,发挥联盟集群效应。同时,抓住数字化改革机遇,以产业发展、产品销售、服务供给等为主线,加快联盟数字化场景运用，推动形成线上线下互动局面,强化联盟引领共同富裕的带动效应。

参考文献:

[1]薛美琴,马超峰.关系网络再造:社会组织联合党建的行动逻辑——以江苏省党建联盟的实践为例[J].探索,2020(6):134-143.

[2]徐勇.国家化、农民性与乡村整合[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4]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5]屠霁霞.抱团发展模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的经验分析[J].河南社会科学,2021(1):42-48.

[6]林悟然,梁宇超,杨璨灿.基层党组织建设:现状、困境与突破[J].国家治理,2021(45):38-42.

[7]孙敬良.新生代、中生代、老生代员工的需求冲突与化解策略[J].领导科学,2019(2):70-72.

[8]李青霞.制度环境、组织能力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研究[J].学习论坛,2021(1):91-98.

[9]葛亮.制度环境与社会组织党建的动力机制研究———以Z市雪菜饼协会为个案[J].社会主义研究,2018(1):104-112.

[10]吴新叶,吕培进.在“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之间:基层党建联盟的活力空间[J].学术界,2021(7):83-94.

责任编辑:徐书琴

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调查与思考

李进儒　于盈

（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江苏　南通　226300）

[摘要]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下，新型储能是各地抢占能源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迎来重要的发展风口，锂离子电池在新型储能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新型储能产业链以锂电产业链为主。“十三五”以来，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初具规模、代表性企业发展迅速、科创水平不断提升，但也存在产业规划不明晰、产业链条不完善、核心竞争力不强、规模化应用受阻、产业人才紧缺等短板，需从产业布局、技术创新、市场建设和要素环境等方面着手，推动新型储能产业创新发展。

[关键词]通州区　新型储能　产业链

新型储能通常是指除抽水蓄能以外的新型储能技术，包括新型锂离子电池、液流电池、飞轮、压缩空气、氢（氨）储能、热（冷）储能等。随着新能源开发规模快速扩大、负荷峰谷差持续拉大，发展新型储能是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保障电力系统安全运行的必然要求。新型储能配置灵活、建设周期短、响应速度快，已经成为全球应用范围最广、发展潜力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储能方式，也是催生能源新业态、抢占能源战略新高地的重要领域。“十三五”以来，我国新型储能实现由研发示范向商业化初期过渡，锂离子电池、压缩空气储能等技术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进入“十四五”，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下，我国新型储能迎来了重要的发展风口。

一、新型储能产业前景及产业链分析

（一）新型储能产业前景

根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CNESA）的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球新型储能累计装机规模 25.4GW，其中我国新型储能市场累计规模 5.73GW，储能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但我国储能与新能源装机规模的比例（简称“储新比”）仍不足 7%，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平均储新比已达 15.8%，我国储能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发展趋势看，根据中国能源研究会的权威预测，到 2025 年全球电化学储能预计新增 170GW，其中全国预计新增 80GW；全球市场规模将超过 5100 亿元，其中国内市场超过 2400 亿元。从政策要求看，2021 年 7 月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发布《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 年实现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转变，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 30GW 以上，到 2030 年实现新型储能全面市场化发展[1]。从各地规划看，湖北、浙江、广东、安徽、河北、内蒙古等 12 个省份 2025 年规划装机规模近 30GW，《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也提出到 2025 年全省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 2.6GW 的目

收稿日期：2022-09-13

作者简介：李进儒，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讲师。于盈，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党校讲师。

标[2]。从市场热度看,新型储能正处于从商业化初期向规模化发展的爆发式增长阶段,大型央企、国企纷纷跟进布局储能产业。2021 年,储能指数大幅跑赢创业板,年末指数 1648 点,全年整体上涨 64.8%,15 家龙头储能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总额超 250 亿元。

(二)新型储能产业链分析

在新型储能产业中,电化学储能中的锂离子电池(磷酸铁锂电池、三元锂电池、锰酸锂电池、钴酸锂电池)占据主导地位,市场份额约 90%,因此新型储能产业链以锂电储能产业链为主。

新型储能产业链上游为基础材料,其中正极材料决定电池属性,价值占比较高,近年来电池材料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出,市场份额较为分散。中游为储能系统,其中储能电芯技术壁垒较高,直接影响整个储能系统的效率、成本和性能,价值占比 60%,在产业链的利润分配占比最大;储能变流器(PCS)技术国内已较成熟,市场竞争格局相对稳定,价值占比 20%;储能集成系统是一体化程度很高的业务,难点在于如何控制成本且高效安全运行,电池管理系统(BMS)、能量管理系统(EMS)分别占比 6%、12%左右。下游为储能系统的运营,电源侧储能能够平抑间歇性可再生能源发电波动、消纳大规模过剩电能;电网侧储能用于减少或延缓电网设备投资、缓解电网堵塞、提供调频、无功支持等服务;用户侧储能主要起削峰填谷、峰谷套利等作用,峰谷套利是用户侧储能的重要收益来源。(见表 1、表 2)

二、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现状分析

(一)产业发展概况

1.储能产业初具规模

南通全市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较快,重点储能企业约 20 家,涵盖了储能电池、正负极材料、电池隔膜、电解液等产业环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

表 1 新型储能产业链构成及龙头企业表

产业链构成		龙 头 企 业
上游原材料	正极材料	容百科技、贵州振华、长远锂科、厦门钨业、杉杉股份
	负极材料	璞泰来、德方纳米、万润新能源、贝特瑞、国轩高科
	电解液	天赐材料、新宙邦科技、江苏国泰
	隔膜	恩捷股份、中材科技、星源材质、沧州明珠
	结构件	科达利
中游储能系统	电池	宁德时代、派能科技、国轩高科、比亚迪、鹏辉能源、亿纬锂能、比克动力、华阳股份
	储能变流器(PCS)	阳光电源、科华数据、科陆电子、固德威、科士达、索英电气
	电池管理系统(BMS)	科工电子、高特电子、星云股份
	能量管理系统(EMS)	南都电源、阳光电源、中天科技、国电南瑞、上能电气、科陆电子、许继电气、盛弘股份、华自科技
	辅件(消防、温控、热管理)	青岛消防、国安达、英维克、同飞股份、松芝股份、银轮股份、中鼎股份
下游运营	电源侧	国家能源、中广核、中国华能、中核集团、国家电投、深圳能源、晶科电力、林洋能源、万里扬、国投电力
	电网侧	
	用户侧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表 2　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分布表

分类	应用场景	应用占比	
电源侧	储能+常规机组	41%	12%
	风光储		6%
	风储		9%
	光储		14%
电网侧	独立储能	35%	20%
	变电站		8%
	汇集站		4%
	其他（应急电源、多站融合等）		3%
用户侧	工商业	24%	12%
	产业园		8%
	EV 充电站		2%
	港口岸电		0.7%
	其他（海岛、校园、社区）		1.3%

资料来源：CNESA 全球储能项目库

链，2021 年全市储能产业产值超 200 亿元。

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自“十三五”以来加速发展，截至 2021 年底，全区新型储能重点企业有 5 家，实现规模产值近 70 亿元，占通州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6.2%，同比增长 45.8%，是通州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之一。

2.储能企业发展迅速

通州区储能代表性企业有沃太能源、海星电子、国轩新能源和江海电容器四家。（见表 3）

沃太能源是国际知名的储能系统集成供应商，其自主研发的锂电储能系统、能源管理系统等产品覆盖多个应用领域，海外市场出货量在国内储能集成商中排名第三，仅次于阳光电源和比亚迪。

海星电子是国内铝电极箔行业领军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连续 24 年入选中国电子元件百强企业，于 2019 年在国内主板上市，全球市场占有率 9.2%，全球排名第二。

南通国轩新能源是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的孙公司，有效整合国轩高科在动力电池行业和东源电器在输变电行业的优势资源，拥有储能系统和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两大特色产品。

江海电容器专业从事电容器及其材料研发，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连续 26 年主要指标在全国电容器行业名列前茅，是江苏省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江海储能为其全资子公司，致力于超级电容器的应用开发。

3.科创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通州储能企业科创水平不断提升。沃太能源现拥有发明专利 15 项、实用新型专利 40 余项、外观设计专利 20 余项，立项多个国家、省、市级科技计划项目，获评 2021 年国家级专精特新科技“小巨人”企业、顶级光伏品牌–储能及 2022 年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等荣誉。海星电子的铝电极箔产品属于工业“四基”中关键基础材料，列入国家战略性新产品指导目录，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此外，与储能产业紧密相关的新能源装备产业也有较快发展，如宏德特种部件近年来取得 13 项发明专利，今年 4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通达动力专为国内外大中型电机企业提供

表 3　通州储能企业情况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产业类别	主要产品	现有产值（亿元）	同比增幅	镇区园
1	沃太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储能系统集成	储能柜、集装箱	6.43	91.6%	高新区
2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储能基础材料	电极箔	18.06	46.7%	平潮镇
3	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储能系统集成	集装箱、充电设施	6.29	87.3%	高新区
4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储能元器件	电容器	33.66	33.1%	平潮镇
#	南通江海储能技术有限公司	储能元器件	超级电容器	2.39	46.8%	高新区
5	南通新三能电子有限公司	储能元器件	电容器	2.82	37.0%	兴仁镇

注:# 南通江海储能技术有限公司系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各类定转子冲片和铁芯,2021 年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二)产业发展短板

当前，新型储能在我国电力市场中仍属新兴事物,其蓬勃发展的背后依然存在技术安全、成本控制、商业模式等众多亟待解决的难题,而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存在诸多短板。

1.产业规划不明晰

当前，通州区对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还没有形成统一规划、出台产业政策,对储能产业链还没有长远、科学布局。项目招引上,储能产业相关的顶级资源与重大项目缺乏，对外招商的吸引力和对顶级资源的集聚力较弱，难以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导的核心产业链。

2.产业链条不完善

通州区储能产业链上游和中游均有涉及,但专注储能产品开发应用的企业数量少、产品种类少,不成体系。上游产品主要为铝电极箔、电容器,均属于电磁储能产品，与锂电等电化学储能产业关联不大,锂电储能上游产品还是空白。中游有沃太和国轩两大系统集成商,均单打独斗,系统集成需要的关键材料和部件依赖苏南、深圳、东莞等地区供货,本地配套非常少,全区储能产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和竞争优势。

3.核心竞争力不强

通州缺乏储能产业链重要核心环节，如中游储能电池和储能变流器两大环节,技术壁垒高、价值占比大,通州尚未有布局。从企业看,主要企业沃太能源产品 90%面向国外市场,在国内市场中出货量极少，而国外市场的出货量也不足排名第一的阳光电源的四分之一。国轩新能源由于集团内部自成体系，动力电池等关键核心环节依靠母公司国轩高科,企业在行业中缺乏核心竞争力。

4.规模化应用受阻

目前，江苏不少城市已在新型储能应用上迈出步伐,而新型储能在通州的应用非常有限,一方面有全国层面的共性原因，如电力市场机制不完善、投资回收机制不清晰、用户积极性不高等。另一方面,通州目前电源侧、电网侧储能几乎为零,没有大型风光发电储能项目;在用户侧,分布式光伏目前的运行模式主要为“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受装机容量、自然条件等影响，实际上网电量有限,对储能的需求较小。

5.产业人才紧缺

与储能产业发展需求相比，企业急需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和懂设备、能操作、会维护的高技能人才紧缺。南通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人才资源储备等方面与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存在较大差距，人才总量和人才综合竞争力还不能满足储能产业发展的需要。

三、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思路

2022 年初，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市场主导、有序发展”的基本原则,明确了新型储能独立市场地位，着力解决新型储能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补偿机制、盈利模式不清晰等关键问题[3]。“十四五”期间,随着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电

力现货市场不断成熟、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分布式能源体系逐步完善、电动汽车快速普及等，新型储能市场规模将稳步攀升。在此背景下，通州区新型储能产业的发展恰逢其时，储能产业的提质升级需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一）加强统筹规划，厚植新型储能产业沃土

新型储能作为新兴战略性产业，对抢占新能源高地、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需“统筹”谋划，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用。一是制定新型储能产业规划。对照国家、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结合通州实际情况适时出台区级方案，明确全区新型储能发展目标、总体布局和重点任务。将顶层设计具体化，确定推动新型储能运用的具体任务，明确任务牵头方以及推进计划和时间节点。二是加强与省、市储能产业发展衔接。鼓励储能项目统一接入南通市电力统调，在电网故障、用电紧张、有序用电等特殊时段，接受电网公司统一调度。三是构建新型储能产业领导机制。成立区级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建立区镇二级对接和相关部门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层级、区域间的工作壁垒，确保新型储能产业规划落地落实。

（二）加快招大引强，推动新型储能集聚壮大

通州现有储能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产业链不完整、竞争力不强，亟需加快大项目、好项目的招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推动产业集聚壮大。一是加快新型储能强链补链。对照短板，摸排国内外重点企业，形成产业链图谱，重点围绕上游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隔膜、动力电池以及中游储能变流器、电池管理系统集成等环节，重点引进宁德时代、阳光电源、比亚迪等头部企业。积极推动新型储能全产业链发展。支持本土龙头企业勇当产业链“链长”，吸引储能上下游企业来通州落地，拉动产业链集聚延伸，打造储能战略产业集群。二是推动新型储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融合发展。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指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 左右，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4]。汽车及零部件产业作为通州主导产业要加快突破发展瓶颈，大力引进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整车制造企业，与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互联网、电子信息、通信等领域互动融合，形成新型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协同演进的良好生态。三是加大储能产业链上下游配套。支持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产业协作，加强产品配套、资源共享，形成从材料生产、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行检测到资源回收等较为完备的新型储能产业集群。同时加快新能源装备产业布局，重点围绕大中型电机、风力发电机等装备产业，为新型储能提供产业配套，形成储能产业与新能源产业融合促进的发展格局。

（三）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新型储能核心竞争力

尽管目前锂离子电池已经占据新型储能绝大部分市场，但其规模化、产业化发展仍需跨过安全和成本两道坎，要加强储能技术战略性布局和系统性谋划。一是加大新型储能关键技术研发。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企业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开展储能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攻关，加速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化。重点聚焦电池本质安全技术、智能调控技术等方向，指导区内储能领域重点企业开展百兆级长寿命、低成本、高安全、高效率的先进电化学储能材料以及大容量、长时间的新型储能技术研发，鼓励企业积极申报省重点研发计划。二是搭建新型储能技术创新平台。支持新型储能重大平台载体建设，加强与北京大学长三角光电科学研究院的深度合作，稳步推进沃太能源与南开大学合作的允沃能源研究院建设，探索建立储能产业协同创新联合体。支持企业开展储能领域国际合作，通过设立海外研发机构、引进储能领域外国专家，提升区内企业国际化水平。三是建立新型储能产业产学研合作机制。充分整合企业、高校院所资源力量，定期开展新型储能领域产学研合作交流活动，有效推动储能企业和高校院所的精准对接和深度融合，扶持培育各级各类新型储能人才项目，建立企业、高校院所、政府三位一体的协同支持机制。

（四）积极示范应用，推进新型储能市场化进程

《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重点发展电源侧新型储能，有序发展电网侧新型储能，灵活发展用户侧新型储能，探索新型储能多种商业模式。一是推进建立“新能源+储能”机制。鼓励区内新能源发电项目配建储能电

站,对于不具备配建储能条件的,可购买调峰服务实现储能,力争建成一批“风电+储能”“光伏+储能”试点示范项目。鼓励电网企业投资储能,尝试探索实施电网企业投资储能的配额制,投资成本纳入其输配电业务的成本核算。同时,积极开展首台首套重大技术装备示范、储能科技创新试点示范,加强试点示范项目的跟踪监测[5]。二是加快推进用户侧储能。加大调研考察力度,合理配置用户侧新型储能的规模和节点,引导在电力负荷峰谷差大、系统消纳能力薄弱、改造成本高等区域建设新型储能项目,鼓励用户充分利用分时电价政策,主动削峰填谷,优化区域电网负荷需求,减少尖峰电费支出。建立用户侧储能的效益与权益分配机制,切实保护用户侧储能投资的合法权益。鼓励用户侧储能参与需求侧响应计划,制定合理的准入条件、补偿标准和参与方案,提升需求侧管理水平。三是探索新型储能商业模式。大力推进5G基站、数据中心、充电设施(换电站)等储能多元化应用,探索一批可推广的商业模式。如通过电动汽车探索分布式储能,将车网互动充电桩资源纳入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探索储能融合发展新场景[6]。

(五)加强要素保障,营造新型储能良好市场环境

当前,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的电力市场机制尚未健全,需要在推进过程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且新型储能技术含量高、投资周期长,需要人才和资金等要素的大力支持。一是加快电力市场体制机制保障。完善适应新型储能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鼓励配建新型储能与所属电源联合参与电力市场,探索建立独立储能作为新型市场主体参与中长期和现货市场交易机制,探索确立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市场的技术标准、交易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二是加大新型储能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加强储能技术人才工作的统筹规划,依托重点企业、合作院校开展团队式、靶向式引才,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订单式培训,培育更多本土技能型人才。三是强化对储能项目建设运营的金融支持。鼓励金融投资机构为示范项目提供绿色融资支持,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成立储能专项发展基金等方式引导产业资金注入新型储能产业。加大金融创新,可通过储存的能源在金融机构实现抵押融资[7],开发新型储能市场的金融衍生品来进一步盘活资金流。

参考文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2021-7-24)[2022-8-17].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 -07/24/content_5627088.htm.

[2]江苏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江苏省“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2-8-1)[2022-8-17].http://fzggw.jiangsu.gov.cn/art/2022/8/8/art_83783_10566543.html.

[3]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十四五”新型储能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22-3-22)[2022-8-30].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 -03/22/content_5680417.htm.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的通知[EB/OL].(2020-10-20)[2022-8-30].https://www.miit.gov.cn/jgsj/ghs/zlygh/art/2022/art_158cc63ebe76470cbff2458c4328ea22.html

[5]陈丽莎.推动新型储能实现高质量发展[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21(34):72-73.

[6]本刊编辑部.加快储能产业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J].发展研究,2021(4):10-17.

[7]曾鸣.推进我国储能商业化的难点与建议[J].中国电力企业管理,2019(31):28-31.

责任编辑:徐书琴

乡村振兴战略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
——以南京市浦口区为例

南京市浦口区委党校课题组

[摘要]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做好“三农”工作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巩固乡村振兴战略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本文通过梳理南京市浦口区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模式，分析其经验成效和突出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供相关部门借鉴参考。

[关键词]乡村振兴 村级集体经济 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有利于推动“共富”，激活乡村资源资产要素潜力；有利于推进“共治”，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凝聚发展力量；有利于实现“共享”，推动先富带后富、强村带弱村。浦口区是南京市涉农街道最多的郊区，也是国家级江北新区建设的“主战场”。近年来，浦口区把集体经济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举措来抓，依托体制机制创新，深入探索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一、浦口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索

浦口区坚持“巩固提升”和“路径拓展”两手抓、政策引导和机制创新相结合，盘活各类资源、资产、资金，不断增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实力，持续带动农民增收致富。2021年度全区68个涉农村（社区）、1372个组两级集体资产总额26.27亿元，村均3863万元；村级总收入为5.35亿元，村均787万元，其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2.46亿元，占总收入46%，村均362万元，同比增长8.6%，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一）党建引领，打造“头雁方阵”

加强基层党建，充实村（社区）“两委”班子，充分发挥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永宁街道侯冲社区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首要任务，切实发挥“书记抓”的政治优势，擦亮“支部+协会”党建品牌，凝心聚力、全面动员，打造集体经济发展引擎。桥林街道林蒲社区开辟“党建+合作社”模式，打造生产、经营、销售、维护等产业链闭环，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共享发展，让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飘扬。

（二）盘活资源，提升资产收益

坚持分类处置、方式灵活原则，升级改造旧村部、旧厂房等闲置资产，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汤泉街道三泉社区盘活100亩闲置农用土地，建

基金项目：南京市党校系统2021-2022年度调研课题“习近平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的基层实践研究——以浦口区集体经济发展路径为例”（立项编号：21XT26）。

收稿日期：2022-09-20

课题组组长：修楠（中共南京市浦口区委党校高级讲师）；成员：陈娟娟、柏一秋、亓媛。

设30亩大棚,用来种植西瓜、玉米、甜瓜、蔬菜等多种生态产品,打造三泉社区的“一村一品”。桥林街道南驿村利用区位优势,选定两个地块打造智慧停车场,带动辖区村民就业的同时,每年通过租赁和收取停车费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50万余元,推动“闲资源”变成“活资产”。

(三)抱团联合,扩展发展空间

组建村(社区)集体合作社联盟,及时根据订单跨村调配不同季节、不同村(社区)社农的农副产品资源,实现利益共享、多方共赢。江浦街道同心社区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下设劳务、物业、商业管理等公司,打通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最后一公里。星甸街道双山村青创农产品销售专业合作社和王村芋山脆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出的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农副产品礼盒,整合了多种特色农副产品。

(四)统一服务,带动农户增收

成立专业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等,改善基础设施和专业服务,为农户生产经营提供农资供应、品牌营销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汤泉街道开展高规模苗木标准生产,培育壮大苗木工匠队伍,开拓苗木产业新市场,促进苗木产业转型升级,各村(社区)共种植4万多亩林木,带来3亿多元的可观收入。桥林街道茶棚村实体化运作股份经济合作社,扶持当地有茶叶生产销售经验的农户成立公司,推出“茶棚春”品牌,引进专业人才运营,分工协作、深耕市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技术培训、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促进效益提升。

(五)农旅融合,发展“美丽经济”

整合资源优势,深入挖掘利用乡村特色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休闲观光、农创文旅、绿色康养等新产业新业态,根据乡村不同的优势特点制定不同的产业发展规划。江浦街道白马社区坚持以民宿、客栈为核心业态,打造“不老村”,开创以农趣体验等为主的乡村旅游3.0模式,30余家民宿、客栈和商户成立“客栈联盟”,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永宁街道大埝社区依托青奥自行车文化资源,建立协同互利的发展机制,形成游、购、娱、住一站式旅游综合体,实现村集体增收近3倍,带动村民致富。

(六)村企共建,提升产业层次

开展村企合作,集体经济组织和企业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星甸街道汤集村借势“村企联建”,与江苏食米香电商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市浦口区雨藤家庭农场2家单位开展共建合作,以电商、社区团购等方式带动农副产品销售,实现月销售收入7万元。与南京银行开展帮扶结对及联建工作,每年帮助村集体增收20万元。桥林街道刘公村结合“一村一品”项目,与骨干企业融合共建,加强农户、企业、社会机构的沟通衔接功能,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把党员集聚到产业中、把群众带到致富项目里。

二、浦口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困境

浦口区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与乡村振兴的新要求和农民群众的现实期待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生动力不足

内生动力不足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调查显示,21%的村干部缺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主动性,存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有的村(社区)思想重视程度不足,缺乏创业的精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等政策、等倾斜的思想。部分村(社区)集体资产拆迁产生多至几千万元补偿资金,但由于对政策把握不准及市场风险应对能力不足,不敢将资金用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未能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专业人才短缺

专业人才缺乏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调查显示,现有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职责、权限上交叉重叠,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尤其是缺少懂经济、懂产业、懂经营并且愿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的领头人。绝大部分年轻人外出务工,留守村民年龄老化,一些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学习农业专业技能较慢,容易影响工作进度。

(三)可利用资源有限

可利用资源有限是影响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主要限制条件。调查显示,有的村(社区)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观意愿,但由于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可利用资源有限;有的村(社区)集体土地、山林、水库等资产全部包产到户或组,无集体资产可用;有的村(社区)集体资源利用率低,为降低风险简单将集体资产一次性出让或发包,缺乏可持续收入。

(四)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是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受限的重要因素之一。专项扶持资金不足，村级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标准未明确，经费来源及各级财政分担制度未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分账管理的后续保障未明确。土地政策瓶颈难以突破，征地留用地政策规定，可以按照征收农用地面积的2%核定建设用地规模，留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用于发展二三产业用地，但在实际操作中，审批难度较大，难以发展集体经营性项目。

三、进一步推进浦口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以“组织”创新激活内生动力

充分发挥村（社区）基层党组织堡垒作用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关键。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党建+”模式，推广“支部+协会”“支部+合作社”模式，将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注入持久活力。二是选优配强村（社区）“领头雁”队伍。将德才兼备、经验丰富、懂科技、有经营管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选配到村级领导岗位上，优化村干部的年龄结构，提升村干部的文化层次，打造一支素质高、懂创新、善致富的基层干部队伍。三是强化“三农”人才支撑。通过资源盘活、产权开放、荣誉授予等举措吸引能人下乡，通过项目合作、共建工作站等方式吸引高科技专业人才，通过市场化选聘吸引专业运营团队，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善经营的人才队伍。

（二）以“政策”创新强化外部帮扶

加快构建村级集体经济政策支持体系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着力点。一是强化财政资金保障。设立专项资金，扶持优质高效的集体经济发展示范项目。整合各类涉农资金，提升涉农资金使用效益。二是落实税收减免政策。因地制宜实施个人所得税、房产税、契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为集体经济发展减负增效。三是强化资源赋权。加强土地政策支持，统筹建设用地指标。探索股份权能实现新形式，增加集体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渠道，赋予集体和农民更多的财产性权利。

（三）以“产业”创新构筑发展基础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一是坚持因地制宜。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统筹考虑经济基础、市场需求、产业布局、人文特色等因素，开发培育特色优势乡村产业，做到“资源、模式”双落地。二是搭建平台载体。组建区、街、村级联合发展平台，统筹资源要素，形成“区级负责、区域统筹、街村联动”发展模式，打造以区带街、以街带村的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确保资源互补、产业互通。三是深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村级集体资产利用率。注重产品研发，培育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增加产品附加值。推广“农超对接”“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形式，最大限度实现产销一体化。

（四）以“结构”创新推进乡村治理

建立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又有利于实现乡村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一是推进“政经分离” 改革。在集体经济迈入发展和扩张阶段后，厘清治理边界。建立群众监督机制，建立“政经分离、权责明晰”的基层治理结构，保障集体经济“依法依制”安全畅行。二是推动“三权分置”。将经营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置，探索集体经济治理结构同农村社区治理需求相适应的制度。完善激励与约束并存的治理结构，落实关涉集体经济发展和组织成员利益等重大事项的股东民主决策制和监督机制。

（五）以“机制”创新加强利益联结

建立健全多元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广大村民共享发展成果。一是强化内部管理。注重集体经济内部治理结构的完整性、系统性，严格财务预决算、收益分配等配套管理制度的执行与监督程序。推进村务财务公开，保障集体成员的各项权利。二是明晰产权划分和收益分配。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引领农民合理合法参与合作生产和利益分配。加强村街联合，明确各自产权边界和投资比例。保障农民的收益分配权，科学制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留比例，打造利益共同体，实现多方共赢。三是建立联农带农机制。整合农业农村资源，通过联合生产、联合服务、农业开发等方式使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激活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机制，注重小农户的发展状态，注重区域联合扶“弱”助“小”，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科学发展、稳步发展、可持续发展，让集体经济强起来、农户真正富起来。

责任编辑：朱少家

列宁对经济主义思潮的批判及其方法

——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为中心的考察

尚英萌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山东　日照　276826）

[摘要]十九世纪末，经济主义思潮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方兴未艾。列宁在接到经济主义思潮的代表作“青年派的信条”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经济主义思潮对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冲击。为坚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想信念、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列宁作《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从斗争策略、指导思想、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和主要任务五个维度对经济主义思潮展开系统批判。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时运用的实事求是方法和辩证分析方法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具有方法论层面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列宁　经济主义思潮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　批判　方法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出现许多新变化，各种扭曲、误读、攻击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论述的错误思潮也相伴而生。经济主义思潮曾在社会民主党内占据一时优势，是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典型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以下简称《抗议书》）是列宁在流放地接到被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称为俄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的信条”（以下简称“信条”）的经济主义文件后起草的。“信条”中充斥着鼓动工人变政治斗争为经济斗争等错误观念，其作者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的成员叶·德·库斯柯娃。为坚定党员理想信念、捍卫马克思主义，列宁召集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同在米努辛斯克专区叶尔马科夫斯克村流放地的 17 位马克思主义者开会讨论了“信条”和批判“信条”的《抗议书》，与会 17 人一致通过并签署了《抗议书》。《抗议书》对“信条”中的错误论断和观点展开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列宁在批判“信条”时所运用的方法，对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坚定党员理想信念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实践价值。

一、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缘由

经济主义思潮妄图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修正、歪曲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使之堕落为改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与马克思主义站在对立面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生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经济主义思潮极具迷惑性，使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社会民主党人发生了思想动摇。鉴于此，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人必须要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澄清经济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捍卫和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一）“青年派的信条”使列宁深谙经济主义思

收稿日期：2022–08–30

作者简介：尚英萌，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孙迪亮，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入选专家，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潮的误导性和破坏性

早在“信条”传入列宁之手前,经济主义思潮已颇具影响力。经济主义思潮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工人经济运动取得的可喜成绩,使得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将暂时的成就幻想成最终的目的;二是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妄图通过作出一定的妥协让步来迷惑无产阶级。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此所惑,坚决支持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而反对政治斗争。甚至在1895年列宁领导创立的、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最早萌芽的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中也出现了力挺工人阶级仅作经济斗争的“青年派”,他们另立中央,完全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领导工人运动的政治斗争学说。由于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是俄国当时所有组织中最大、最成熟、最有影响力的组织,这使得“青年派”的思想迅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国各主要城市,“青年派”的拥护者遂遍布俄国全境。此外,国外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深受其害,分裂为“青年派”与“老年派”。国外“青年派”成员叶·德·库斯柯娃对经济主义思潮赞不绝口,并为其写作“信条”。“信条”在社会民主党人尤其是“青年派”中间广泛流传,列宁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从“青年派”活动较为活跃的彼得堡将“信条”寄给了身处流放地的列宁。

接到“信条”后,列宁精准捕捉到了经济主义思潮的误导性和破坏性。“信条”全景式地展示和概括了彼时的经济主义思潮,其错误论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出发,认为对政治自由的争取应归功于资产阶级,忽视无产阶级的努力;二是对比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与“现状”,认为工人政治斗争的低迷表明经济斗争已成为工人运动的唯一出路,并借此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妄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三是支持工人政党放弃独立的领导地位,改变对反对派政党的态度,主动配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积极参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活动;四是抹杀工人运动的阶级性,幻想动员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社会力量帮助无产阶级谋求解放;五是将上述言论套用到俄国,得出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唯一出路是帮助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并参加资产阶级自由派活动的谬论。列宁在接到“信条”后,深刻认识到了经济主义思潮对无产阶级及其解放事业的误导性和破坏性:第一,经济主义思潮假借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致使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迷失方向、思想混乱;第二,经济主义思潮反对工人政党独立的实质是支持资产阶级自由派夺权,进而继续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第三,经济主义思潮“集社会之力解救无产阶级”的说辞只不过是一种空想,资产阶级只想榨取剩余价值而不可能真正关心无产阶级;第四,经济主义思潮对俄国工人运动形势的误判,会使俄国走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继而导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疾而终。基于此,列宁在接到“信条”后,于1899年8月写作《抗议书》,意图系统地批判经济主义思潮。值得注意的是,《抗议书》只是拉开了列宁同经济主义思潮作斗争的序幕;此后,列宁又写作《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等一系列论战性文章,并修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希冀摧毁经济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1902年《怎么办?》的问世宣告了经济主义思潮的彻底失败。

(二)经济主义思潮使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发生思想动摇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外对马克思主义发起攻击。1883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去世;12年后,自称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也与世长辞。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内部阵营发生分裂,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诋毁、污蔑马克思主义,具体如下:

从19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初,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外。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19世纪40年代起)一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所谓“根本敌对”,即马克思主义以及与其斗争的理论都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1]150。在这50年间,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领导批判了四种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基地之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青年黑格尔派哲学上的唯心主义;经济上坚守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存的普鲁东主义;反对国家和独立政党的巴枯宁主义;以杜林为代表,只承认“纯粹经验”、反对唯物主义的实证主义。上述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因其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因而迷惑

性不大，马克思主义者能清醒地认知到上述思潮的错误之处，自然不会发生思想动摇。

19世纪90年代以后，生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崭露头角。“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50年(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1]149 这个派别就是尾随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民粹派，此后新生的经济主义思潮也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民粹主义、经济主义思潮“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基地上”[1]150 修正、反对马克思主义。如果说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基地之外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被影响者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与马克思主义站在共同基地上的经济主义思潮的受众群则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甚至社会民主党人。囿于经济主义思潮假借马克思主义外壳的迷惑性、伪装性、内隐性，当马克思主义者受到经济主义思潮的冲击时，难免会无法理清马克思主义与经济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继而迷失方向、动摇思想、不知所措。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时曾写道：“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有许多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赞成这种观点。但是，无疑总会有人赞成这种思想的。”[1]86 由是观之，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可能成为经济主义思潮的拥趸，俄国普通民众更是如此。如果放任经济主义思潮自由发展，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指导思想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极有可能被修正为改良主义，这样一来，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便只能付之东流。列宁敏锐地觉察到了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同与马克思主义站在共同地基上的经济主义思潮作斗争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遂写下《抗议书》等多篇著作批判经济主义思潮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诘难与扭曲，以期坚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信念、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

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是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阵营在经济、社会、军事等力量上都远优于社会主义阵营。上层建筑必然要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决不会容许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学说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受到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也就不足为奇了。”[1]148 因此，当资产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而捏造的经济主义思潮出现时，一方面，无论是出于对无产阶级的同情、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还是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维护和遵循，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应坐视不管，而是要竭力对资产阶级所维护的、恶意攻击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思潮作批判。需要注意的是，批判本身不是目的，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终极目标是澄清、阐明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正名。列宁在《抗议书》中开篇便指出了本书的写作目的：“告诫全体同志务必防止俄国社会民主党脱离既定路线，这条路线就是组织一个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密切联系的、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当前任务的独立的工人政党”[1]86。此外，列宁每每批判完经济主义思潮及其错误论断，都会阐明该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以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由是观之，相比于单纯批判经济主义思潮，列宁作《抗议书》的重心更偏向于捍卫、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

另一方面，在同经济主义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会得到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这种理论本身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其进行不断创新和发展，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发展的重要路径：一是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总的原则指导，但囿于时代、地域，它不可能回答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问题。而经济主义思潮是19世纪俄国的产物，在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的指导下，结合时代要求和特殊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时代之问与国家之题，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二是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有助于从侧面加深无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不减反增。诚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却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1]149。

二、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维度

经济主义思潮以西欧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为考察对象，分析了以往西欧工人政治运动高

涨的条件和“目前”西欧工人政治运动冷淡的缘由，从西欧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由政治斗争转为经济斗争的前提出发，推出了三个伪命题：作为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危机、作为工人运动领导力量的工人政党不再独立、作为工人运动依靠力量的工人阶级丧失斗志，意图说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工人阶级开展经济斗争。列宁从前提到结论系统地批判了经济主义思潮的上述论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方法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斗争观，从而批驳了经济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

（一）斗争策略：批判经济主义思潮脱离政治斗争、煽动经济斗争

经济主义思潮以西欧为例，力图说明马克思主义是西欧政治斗争实践的理论表现，“即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1]84。而目前由于“政治活动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1]84 以及无组织的“工厂无产阶级愚昧群众走上舞台”[1]84，党内早已发生“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1]85，即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斗争的根本变化。

列宁从三方面对经济主义思潮脱离政治斗争、鼓吹经济斗争的言论展开了批判：第一，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理路。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政治斗争低迷时期。马克思主义产生时，非政治的空想社会主义风靡一时，正是因为马克思找到了政治斗争这条解放无产阶级的具体路径，马克思主义才真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不是因政治斗争兴盛而生，而是为反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号召无产阶级开展政治斗争而生。第二，阐明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针对经济主义思潮所谓的党内早已发生“实际活动方面的根本变化”，列宁认为这根本不是变化，因为“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1]87，“马克思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1]88。因此，党内出现支持经济斗争的现象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问题在于，在强调经济斗争的同时，“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1]88。质言之，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两者缺一不可。第三，明确了政治斗争的首要地位。马克思阐明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辩证统一关系，但对于两者谁更重要的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列宁根据实践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明了政治斗争的首要地位。“历史经验又确凿地证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1]88-89。

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辩证统一关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政治权利受限时政治斗争是首位”的观点。这为进一步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支持工人政党独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指导思想：批判经济主义思潮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

经济主义思潮先入为主，认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欧工人政治运动的高涨时期。而在目前政治斗争冷淡的背景下，伯恩施坦主义粉墨登场，强调政治革命已不合时宜、资本主义将以经济改良的方式和平转入社会主义。经济主义思潮将伯恩施坦主义奉为圭臬，并以此为据，认为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1]85。

鉴于此，列宁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是一个伪命题，并发出保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一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危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经济主义思潮夸大社会党人争论的产物，他们的真实目的是造成各社会党的分裂。伯恩施坦主义只不过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某一小部分人的思想，而他们要“把革命的工人政党变为改良主义者的党”[1]87 的企图，“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1]87。假如伯恩施坦主义传播到俄国，“也会遭到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同样坚决的回击”[1]87-88。概言之，坚守伯恩施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数甚少，构不成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威胁和挑战，也构不成“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二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唯一旗帜。虽然马克思主义也支持工人将经济斗争作为解放自身的路径，但是马克思主义绝不支持将经济斗争作为工人解放的唯一和最终路径。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成就证明，“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1]92。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推翻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除掉

身上的枷锁、掌握国家政权，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反之，仅开展经济斗争，无产阶级就会永远处于被统治的状态，就无法实现真正彻底的解放。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革命道路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出现危机，反而呈现勃勃生机，当革命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经济主义思潮之流的无理指责时，社会民主党人“要保卫它，使它不致像许多‘时髦理论’那样常常被曲解和庸俗化”[1]92。

（三）领导力量：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放弃工人政党的独立性

经济主义思潮从西欧阶级斗争由政治斗争转向经济斗争的错误前提出发，得出了全世界工人政党都要“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1]85 的荒谬推论。此外，经济主义思潮认为西欧社会民主党是在“已经打扫干净的政治活动场所”[1]86 建立起来的独立工人政党，而俄国社会民主党饱受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的双重压迫，所以必须先完成反对封建沙皇专制的任务，因而目前俄国“关于独立工人政党的议论，无非是把他人的任务，把他人的成绩搬到我国土地上来的结果。”[1]85

对于以上言论，列宁进行了逐一批判。第一，社会民主党可以争取同盟者，但必须保持独立。马克思早就指明了工人政党对其他反对派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反对派政党的反动性，也不能减弱对反对派政党的警惕性。一方面，工人政党不应该把其他反对派政党置于对立面，而“应该支持进步阶级和进步政党去反对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党”[1]89。因此，经济主义思潮所谓“改变对其他反对派政党的态度”是不成立的，因为争取同盟者共同为劳动群众争取政治自由是工人政党的一贯行为。另一方面，“只有独立的工人政党才能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坚固堡垒”[1]92，才能摒弃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其余一切争取政治自由的战士只有同这样一个政党结成同盟并且给它援助才能发挥积极作用”[1]92。因此，不应该是工人政党“参加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而应该是自由主义反对派参加独立工人政党的活动。第二，建立独立工人政党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经济主义思潮声称建立独立政党是俄国照搬他人成绩的结果，“这也只能证明他们完全不懂得俄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最迫切的任务”[1]89-90。一方面，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赞同建立坚强、独立的工人政党组织和领导工人取得政治自由；另一方面，俄国大部分工人也有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觉悟和要求，他们利用报纸发声，表达对政党独立的期盼。概言之，建立独立工人政党是俄国人民群众根据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得出的科学结论，并非照搬他人任务的结果。第三，政党独立已经实现。1898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将《工人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并通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其中明确规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独立的工人政党。因此，经济主义思潮反对在俄国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行为实际上是“大大倒退了一步”[1]91。列宁指明了在俄国建立独立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突出了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抹杀全社会的阶级性质作了铺垫。

（四）依靠力量：批判经济主义思潮幻想联合资产阶级解放劳动群众

经济主义思潮不仅反对工人政党独立，而且主张“党将承认社会”[1]85，他们认为“对于社会阶级的划分持过分死板的看法”，“固执己见的、否定一切的、原始的”[1]85 马克思主义，“将让位于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85。

列宁认为经济主义思潮上述言论的错误有二：其一，抹杀阶级斗争的阶级性质，使马克思主义失去革命性，堕落为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立场，强调要同一切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作斗争。经济主义思潮所谓的“党将承认社会”，其实质在于制造工人阶级的思想混乱、削弱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作斗争的积极性和战斗力。经济主义思潮妄想党承认社会、集社会之力完成解放劳动阶级的任务，但受资本宰制的资产阶级只会为追逐剩余价值而加重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因此经济主义思潮倡导的社会民主党人只需要“适应现代实际情况和根据民主原则改变或改良现代社会”[1]85 是完全掩盖阶级性的和不可行的。从反对政党独立到抹杀阶级性质，经济主义思潮提倡的“民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彻底丧失革命性，堕落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其二，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民主党的基本原则，未能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党将承认社会”意味着党将臣服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党的活动被限定为经济活动。经济主义思潮曲解马克思主义解放劳动群众的本质，拘泥于形式上的解放，满足于经济上的加薪、升职、减时，但事实上劳动群众仍然受制于资

产阶级、没有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政权牢牢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从而彻底解放劳动群众。两者相较，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保障工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而经济主义思潮则只停留于工人暂时利益、局部利益的获取。

（五）主要任务：批判经济主义思潮将经济斗争视为俄国的唯一出路

经济主义思潮低估俄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抹黑俄国工人阶级的形象，认为他们经常为“政治压迫所窒息，甚至发不出纤弱的幼芽”，“不像西欧战士那样具有组织精神的传统”[1]85，最终得出了“参加，也就是帮助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1]86 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出路和“阻力最小的路线”[1]86 的谬论。

对于上述反动言论，列宁用铁一般的事实进行了批驳。第一，经济主义思潮提出俄国工人阶级为“政治压迫所窒息”，“这只能证明他们对俄国革命运动的无知”[1]89。1878 年最终目的为“推翻国家现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1]325 的 “俄国北方工人协会”以及 1875 年强调暴力革命、政治斗争的“南俄工人协会”的成立就是明证。事实证明，俄国工人阶级具有政治主动性和组织精神，他们有意愿、用实行同政治压迫作了斗争。第二，俄国具有深厚的政治革命传统。“民意党人”曾登上过俄国的历史舞台，扮演过“推翻专制制度和为人民争取政治权利”的英雄角色。虽然由于依靠力量弱小、指导理论错误，“民意党人”未能实现其政治夙愿，但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应该“继承俄国以前一切革命运动的事业和传统”，“把争取政治自由当作全党当前任务中最主要的任务”[1]92。第三，列宁深刻剖析了经济主义思潮鼓动工人仅限于经济斗争的真实意图：“让‘自由主义反对派’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参加’下去争取‘法的形式’”[1]90。换言之，经济主义思潮从根本上代表并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利益，鼓动工人进行经济斗争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和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因此，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经济斗争的唯一地位，“就等于政治上自杀”[1]90，这不仅不会帮助俄国工人运动，而且会大大阻碍和弱化俄国工人运动。

三、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方法

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时，充分运用了实事求是的方法和辩证分析的方法：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又运用大量数据资料，还发动民众公开讨论；既肯定经济主义思潮出现的合理性，又否定其错误内容；既全面批判，又重点突出；既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予以创造性发展。

（一）实事求是的方法

当革命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被经济主义思潮歪曲和庸俗化为改良主义，列宁立刻为马克思主义正名，他运用实事求是的方法引导人民群众回归马克思主义，一击即中“经济主义思潮”的靶心。

1.回归马克思主义本相

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反击非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误解，以达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

一是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德文写成的，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必须将其译为俄文。在将德文译为俄文的过程中，由于部分翻译人员缺乏一定的学科素养、背景知识和宽广视野，译文难免会出现词不达意或以偏概全的问题，所以列宁强调“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1]179。

二是还原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主要观点，而且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者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如上所述，经济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于政治运动高涨时诞生，并由此炮制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列宁从马克思主义生成的宏大历史背景出发，以空想社会主义为例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恰恰生成于政治运动低迷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列宁的批判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运用大历史观，考察分析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时期的政治运动状况：“甚至当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全副理论武装（《资本论》），并且组织了著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时候，政治斗争也绝不是一种流行的实践（当时英国有狭隘的工联主义，在罗曼语国家有无政府主义和蒲鲁东主义）。”[1]87

三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貌。经济主义思潮以西欧国家政治斗争惨淡、经济罢工活跃为例，强调注重政治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已不合时宜，从而走上推崇伯恩施坦主义的改良之路。列宁批

判经济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指明马克思主义既支持工人经济罢工,也支持工人政治斗争,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因此,经济罢工活跃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范围,仍在马克思主义的预想范围之内,党内活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2.摆事实讲道理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靠实践检验其正确性。空谈道理很难让人信服,科学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彰显其真理与价值光芒。列宁在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错误论点时,不仅求马克思主义之实,而且求实践与事件之实,力求用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列宁力图用事实支撑其论点。列宁在《抗议书》中将经济主义思潮信奉的“信条”原封不动地置于篇首,这一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列宁忠于事实的态度。此外,列宁批判经济主义思潮的每一论点时,都有事实材料作为支撑,这些材料或是在正文中直接引用,或是用括号加以解释说明。其次,列宁列举的事实具有多样性。列宁引用了大量的事实材料来支撑理论,以图说明论点的必然性而非偶然性。例如,列宁在说明马克思主义产生于“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时期时,就曾列举欧文主义、傅立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对“非政治的社会主义”的解释说明。如此一来,读者便能自行想象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惨淡的时代,经济主义思潮宣传的马克思主义是“比经济斗争占优势的政治斗争在理论上的表现”的谣言便不攻自破。总之,摆出大量事实支撑所要讲解的道理,既有助于读者理解道理,又有利于读者根据事实提升理论认同感和价值判断力。

3.真理越辩越明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真理,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都不应该被刻意隐藏:一方面,真理从来都不怕被公之于众,恰恰相反,它迫切渴望为大众所认知和讨论。马克思主义是经实践检验并被证明正确的科学理论,因此无惧错误思潮的挑战,愿意被公开讨论。马克思主义不会因公开讨论而发生任何动摇。另一方面,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能因其迷惑性、误导性而不被公开,因为这不仅达不到防止其扩散传播的目的,而且很可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结果适得其反。列宁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一定能战胜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挑战,他在《抗议书》中写道:“我们请一切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工人小组都来讨论上面引用的“信条”和我们的决议,并明确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以便消除各种意见分歧,促进组织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事业。”[1]93 发动民众对正反两种思想进行公开讨论,一是有利于了解民情,弄清楚民众的思想动态,找出他们被错误思潮引导的根源所在,以便掌握舆论制高点、对症下药,以真理之“矢”更精准地射中错误思潮之“的”;二是民众在讨论中必然要对两种思想进行思考和比较,这种通过主动学习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认同感要比被动灌输更深刻、更透彻、更强烈、更有力量;三是有利于在全社会掀起一股讨论热潮,只要加以引导和设计,这股热潮便能顺势转化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热潮,从而拓宽马克思主义的受众和影响。

(二)辩证分析的方法

实事求是地批判经济主义思潮要求列宁对经济主义思潮作辩证分析,不能完全否定,更不能完全肯定。对经济主义思潮要做全面、系统的分析,突出重点错误。同时,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更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

1.肯定与否定的统一

人们在批判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时,所犯的错误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思绪被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带偏,完全加入敌对阵营;其二,刻意、全面否定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为了否定而否定。其实,一味否定并非提高说服力的最佳路径,而适度肯定有时却能为否定注入强大力量。

在这方面,列宁对经济斗争的否定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他先是赞同“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承认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给予经济斗争充分肯定;20 年后,国际工人协会第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也“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但是决议同时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应该回避工人阶级的一般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而应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当前,俄国资产阶级勾结沙皇政府对工人的残酷压迫、无情剥削和暴力镇压的事实表明,“当无产阶级没有政治自由或者政治权利受到限制的时候,始终必须把政治斗争提到首位”。列宁“从有到无”“从肯定到否定”抽丝剥茧地批判了经济斗争至上的说法。先肯定后否定或“欲抑先扬”,既能用

宏阔的视野全面、深刻地讲清楚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来源，即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的来龙去脉和历史渊源，又能给听众足够的反应期、过渡期和适应期，使其慢慢理解、逐步认同对错误思潮的批判。

2.全面与重点的统一

列宁认为，在批判经济主义思潮时，既要全面分析，又要重点批判。全面分析时既要对经济主义思潮的内在逻辑作系统梳理，又要对经济主义思潮的错误点作全面回击；重点批判是为了抓住主要错误，并以此带动次要矛盾的解决，打通对错误思潮的批判经络。

其一，对经济主义思潮的理解要全面。全面掌握、深刻理解经济主义思潮是与其作斗争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先悟透“批判”本身，“批判的批判”才不会漏洞百出。列宁在对经济主义思潮及其代表作“信条”展开批判之前，先概述了“信条”的主要内容及逻辑进路：“上面引录的《信条》，第一，是‘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进程的概述’，第二，是‘对于俄国的结论’。”[1]86

其二，对经济主义思潮的批判要全面。正是基于对经济主义思潮的精准把握，列宁才能得心应手地对其展开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到俄国工人运动的结论的全面批判。列宁首先批判西欧以往争取政治自由的工人运动是西欧工人阶级参加的结果而不应全部归功于资本家；其次，列宁又批判了经济主义思潮对西欧工人运动“现状”的误读误解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持的偏见，指明经济主义思潮崇拜的伯恩施坦主义“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坚决谴责”；最后，列宁强调：“由于《信条》作者们关于西欧工人运动的前提不正确，他们得出的‘对于俄国的结论’就更不正确了。”[1]89 从而进一步说明了俄国工人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必要性。

其三，对经济主义思潮的批判要突出重点。只有重点突出，民众才能把握理论命脉，才能跟进思路，抓一点而通全局。列宁在《抗议书》中的每一段论述甚至每一句话，都以政治斗争为中心、为政治斗争服务。如上所述，列宁正是从对“经济主义思潮脱离政治斗争”的批判引出了对经济主义思潮反对政党独立、抹杀阶级性质和鼓吹“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批判。只要抓住政治斗争这个中心和主线，对其余错误观点的批判便顺理成章、自然而然。

3.坚守与发展的统一

实践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理论的创新也应紧跟实践和时代的步伐。在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特别是同“借口现实变化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作斗争时，尤其要注重理论的发展与创新。特别是生活在距离马克思较为遥远的时代，不发展马克思主义，很难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做斗争。但我们不能凭空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应沿着经实践检验正确的道路继续发展。总之，批判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既要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在谈到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支持工人运动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时，列宁科学地预见到了回答两者“谁更重要”这一问题的必要性，“从那时起，各国工人政党已经不止一次提出，当然将来还会不止一次提出一个问题：在某个时候是否应该偏重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或者偏重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1]88 对此，列宁根据俄国的实践，总结出了当工人政治权利受限时政治斗争应排首位的历史经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但列宁同时强调“总的或原则的问题，现在还是同马克思主义原先提出的一样”[1]88，即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不可动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永不过时。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孙来斌. 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J].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 (12):94-104.

[3]夏银平，冯婉玲.列宁对非马克思主义错误思潮的批判及其启示——以《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为样本[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20(5):152-158.

[4]陈红，姜波.列宁早期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2(1):49-56.

[5]程恩富.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整体观——基于十二个视角的全方位分析 [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1):125-136.

责任编辑：马俊

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实践探索与现实启示(1922–1927)

王　淇

(南京师范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开展顺应了青年运动转向期的历史要求,满足了为党培养后备军的现实需要,既是青年团初创时期的发展需要,也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革命需要。得力于团中央的统一指挥和政策制定,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突出了党的引领作用,明确了工作基本单位,通过集体研读党团刊物和马列主义书籍构筑理论阵地,结合团外宣传落实教育训练实践成果。新时代团内教育训练要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坚守“为党育人”的教育初心;形成“以党带团、共学共建”的工作格局;立足团支部,发扬团支部书记的主动精神;与时俱进,推动共青团内教外宣工作的守正创新,更好适应团的宣传工作新局面。

[关键词]青年团　团内教育训练　历史动因　实践探索　现实启示

团内教育训练是一项决定青年团自身建设成效的基础性工作,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①]创立早期的 1922 年至 1927 年间，尤其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历史任务。跨越百年光辉岁月,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艰辛实践与探索，对新时代团内教育训练的开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历史动因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团自成立起便积极投身青年运动,为党的革命事业培育人才,努力完善和壮大团的组织,以适应革命发展的要求。这是革命年代赋予青年团的历史使命，也是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目的与意义所在。

(一)青年运动转向期的历史要求

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点，中国青年运动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历史转向。“五四”前的早期青年运动以接受西方文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为武器，以建立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为目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尽管早期青年运动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反对封建政治与文化的先锋作用,但由于青年知识分子并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束缚,且长期轻视和排斥劳动群众，因而早期青年运动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拉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序幕，为中国青年运动提供了崭新的思想指南。1919 年,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五四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全国性反帝爱国运动，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次认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17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员群体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立项编号:17CDJ004)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22–09–22

作者简介:王淇,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磅礴力量。就在这一系列历史剧变中，中国青年运动的阶级属性转向了无产阶级，指导思想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奋斗目标转向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方式转向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

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转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作为一种发展趋势和历史要求，在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完成的。青年运动转向期所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中国青年实际状况与青年运动新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差距的矛盾。就运动的主体而言，青年运动应是青年整体参与的运动。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群体。因此，在“五四”前后的较长一段时期，青年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少数有觉悟的知识青年，占多数的劳动青年却因处在蒙昧状态而长期缺席。青年整体状况的这种失衡，导致青年运动中多数主体的长期缺席。就运动的阶级属性而言，知识青年多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其自身杂糅的封建性、资产阶级性和小资产阶级性较重；劳动青年由于从事封闭分散的小农生产和低端的工业生产，普遍不具有大工业生产所训练出的组织纪律性和阶级觉悟，无产阶级意识薄弱。且由于阶级间的隔阂与偏见，知识青年对劳动青年怀有明显的排斥心理。此外，中国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充分的认识与研究，对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缺乏分辨能力等实际状况，也与青年运动转向后的新任务新要求相矛盾。为了化解这些矛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青年团发扬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将教育与宣传作为最重要的工作，通过举办平民补习学校、宣讲所、辩论会、游艺会等，广泛组织、教育和动员青年工农与学生投身无产阶级青年运动。诚如马克思所言，“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1]138。为了能够担负起组织教育中国青年的历史重任，青年团将教育训练首先落实在团内的青年同志身上，不仅将团员极力“训练成健全勇敢的斗士”和“有力量的宣传煽动家”，还充分发扬团员在青年中的引领作用，将更多有觉悟的青年吸纳进团组织的教育训练范围内。这充分说明，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是顺应中国青年运动转向期历史要求的一次伟大实践。

(二)为党培养后备军的现实需要

在筹备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的过程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曾考虑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培养成为党的后备力量。陈独秀曾明确提出，要“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预备学校”[2]97。因此，上海和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和预备学校也随即组建。在中共一大会议上，代表们专门研究了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的问题，“讨论发展党员的办法，并决定各地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团员中提拔进步分子入党。”[3]12-13 在此精神的指导下，许多地方党组织的创建都以青年团组织的建立为先导。例如中国煤矿工人最早的党支部——安源路矿工人党支部，就始于一个由八名团员组成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再积极慎重地发展六名工人为共产党员，然后组建党支部。

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青年团培育并输送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澎湃、尹宽、阮啸仙、杨闇公、吴玉章等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都接受了团组织的教育和训练。五卅运动爆发以后，团中央决定“将过二十三岁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强健或创造党的组织”，“前后分化给党的团员三千人以上”[4]488。正因有大量团员补充入党，全国党员人数才迎来第一次增长高峰，从 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召开时的 994 人，增加到 1926 年 7 月的 18526 人[5]39。可以说，在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党员队伍的重要途径之一[6]。

(三)青年团初创时期的发展需要

1920 年 8 月，青年团历史上的第一个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武汉、长沙等地的团组织也纷纷成立。但不到一年时间，青年团早期组织就面临夭折的危险。究其原因，团内教育训练的缺失不容忽视。

首先，创建初期的青年团“只不过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确定了那一派社会主义”。这造成了团内思想成分复杂，既有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等[7]124。例如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就是在吸收了无政府主义青年团体“互助团”的基础上宣告成立的。因为团内思想成分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7]124 思想分歧，进而组织涣散，革命精神也因此不振。大部分团组织

停止活动或暂时解散，创建不久的青年团工作陷入低谷。对于一个新生的革命团体而言，思想的统一、信仰的一致是维护组织团结的重要精神之基。思想基础不牢，组织就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吸取了团内思想混乱的教训，团一大确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青年团明确了统一的思想信仰。青年团通过全国代表大会达成了思想上的共识，但在实践层面，各地团组织仍然需要及时深入持久地开展内部教育训练，不断清除直至根除各类“非马”“反马”思想的影响，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使之成为全体团员一致的思想信仰，为青年团成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革命组织夯实思想基础。

其次，青年团早期组织“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所以在全国各地的都完全失败！”[7]120。因此，重建后的团组织高度重视解决“学生团”问题，要求每位团员都承担起唤醒工人、农民加入青年团的责任，并强调“不当拉进就算，必须使那人于入团之后，若干时之内，能够彻底觉悟”，“凡团内所有的出版物，及在会场内所说的话，务使团员中的农人工人皆能了解”[7]120。要使新入团的工农青年不仅在组织上入团，更在思想上入团，就必须发挥好团内教育训练的作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团员头脑，唤醒阶级觉悟，激发革命斗志。团中央书记施存统也强调：“本团的工人同志，主义的及革命的教育，都很缺乏。我们以后须切切实实地做一番教育的工夫”；“而对于已加入本团的学生同志，更须切实做一番训练的工夫，革除小资产阶级的遗习，完全成了无产阶级化。”[7]320-321

（四）特殊历史条件下的革命需要

在党团组织的初创时期，事实上存在着“党团不分”的工作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创建党组织的早期党员基本都参与了各地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党是秘密组织，而青年团是公开或半公开组织，党常以团的名义开展工作，在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团组织事实上承担起了党应做的工作。这不仅造成了党团工作内容的高度重合，也使青年团的影响力和组织规模一度远超中国共产党。邓中夏一度认为“S. Y. ②为将来无产阶级革命之主力军，其重要不特不减于共产党，实有过之。”[7]256 因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青年团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

虽然肩负革命重任，但青年团在早期尚存在“不能胜任”的困难。其一，青年团以出身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学生为主，无产阶级基础相对薄弱。团员普遍存在的缺点：缺乏责任心、自由行动、不守纪律，“都是小资产阶级的坏遗传”[7]270。其二，团员缺乏独当一面指挥群众运动的能力，且时常表现出的个人主义心理，也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其三，大多数团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与研究粗浅，缺乏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导致团的宣传力量薄弱，宣传范围狭小。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提高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弥补能力上的欠缺，必须依靠团内教育和训练。但受到小资产阶级错误观念的妨害，许多团员“以为受同志的教育是可耻的事”[7]284。至于“我们的训练工作，简直可以说没有做过”[7]272，“组织涣散，活动不大，完全是训练不好之故”，“如果训练得法，个个结实，何至只有这么一点小小成绩！”[7]269 可以说，以当时团内教育训练的开展情况，远不能打造出一支满足革命发展需要的、团结坚固的青年团队伍。因此，施存统深刻认识到：“我们都有急切受主义的教育的必要”[7]285，“我们目下最重要的工作，倒不是向外活动，竟是训练自己。”[7]272

二、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实践探索

在青年团正式成立前，团的早期组织就已经开始了团内教育训练的初步实践。1920 年 9 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的“外国语学社”、1922 年 3 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广东社会主义讨论会等等，都是青年团组织开展团内教育训练的最初尝试。这些有益的尝试虽为党团组织的正式创建培养了工作人才，但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和领导，仍然是一种党团组织自发开展的地方性工作，系统性、规范性不足，局限性明显。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团组织逐渐认识到内部教育训练的重要性与现实短板。团一大召开后不久，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发布通告，强调“应以各地方执行委员会在每月所召集的大会当作最重要的训练机会”，“宜将每月在实际运动所得的经验，和这一个月中国内政治经济情形的变化，演述分析给团员听。”[7]148 1923 年 8 月团二大通过的《教育及宣传决议案》指出：“对于本团团员的教育，须组织特别讲演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作有系统之教育。”[7]370 1925 年 1 月，团三大通过了专门论述团内教育训练的决议案——《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决议案总结了过去团内教育训练的

经验与教训,规定教育训练的方针是“以唯物史观为思想的中心”、“以集权主义为行动的中心”,并提出“学习列宁主义;严守团体纪律;积极参加工作;获得青年群众”[8]64-67的教育训练口号。1925年3月,团中央组织部发布《团内的教育工作》,认为团内教育工作应分为政治及策略研究、地方问题及社会现象分析、研究主义及团体组织[8]111-112。为适应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1925年9月,团中央三届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将一切教育训练工作由组织部移交宣传部负责,并指示各级宣传部的工作重心在“计划与指导全团的宣传训练工作,以及中坚分子之养成。”[8]322 1926年7月召开的团中央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了团内教育训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并对各项工作内容作出具体指示。正是有了团中央的统一指挥和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完善政策,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才能从自发分散状态逐步转向组织化、规范化。

(一)突出党的引领,指导团内教育训练高效开展

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无产阶级革命组织,在政治上和工作上接受党的指导。党也视团的工作为党领导下的工作而加以切实的指导与帮助。在团内教育训练方面,中共四大指出:“C. P. ③以后应尽力帮助S. Y.工作,如派C. P.同志担任S. Y.重要工作及帮助S. Y.训练或教育团员等。”[9]366 中共五大再次强调:“过去C. Y. ④的教育工作等常缺乏,团员对主义与政策之认识均甚幼稚,没有在工作中注意培养新的干部人才,党必须处处帮助C. Y.改进并加紧内部教育训练工作,提高团的政治兴趣,不断的培养新的工作人员。”[10]91-92

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与帮助,为青年团高效开展团内教育训练提供了组织上、教育资源上的保障。第一,党团合组教育宣传委员会。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团内教育训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党内教育在团组织中的延伸。早在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就颁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由党中央和团中央共同组织教育宣传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党中央的政治领导,负责“研究并实行团体以内之政治上的主义上的教育工作以及团体以外之宣传鼓动”[11]25,将团的教育宣传工作纳入党中央的统一指导。依照组织法的规定与指示,上海、安源、济南、九江等地方党团组织纷纷合组教育宣传委员会,统一领导当地党团员的教育宣传工作。第二,学习党内教育实践经验。团内教育训练作为党内教育的延伸,二者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在方法上具有互通性,因此党内教育的成功实践常能为团内教育训练的有效开展提供宝贵经验。北京地方团宣传委员黄日葵在听取留俄回国的党员同志所作的训练工作报告后,深受启发,计划在教育支部团员的工作之外,赋予教育宣传委员会训练、督促支部整顿纪律等工作的权限,从而有效发挥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工作职能,完善团内教育训练的工作体系[12]228。第三,党团合办党校。为满足党团组织的人才需要,1924年5月党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作出“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的决定。被誉为“独一无二之无产阶级组织”的安源地方党团遵照中央指示,召开联席会议,集中整合党团教育资源和人才力量,合办起党的第一所党校(亦是团校)。1924年12月安源党校开学,刘少奇担任校长,安源地方党团组织各选派30名党员和团员到校学习,分初级班与高级班,由刘少奇及安源党团领导同志负责讲授《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年运动史》三门课程[13]37。安源党校开创了中共党校教育的先河,同时也是团校教育的第一次伟大实践。继安源党校之后,长沙、衡阳、广州等地党团组织也陆续效仿合办党校,党团共享教育资源,共学共建,蔚然成风,极大推动了党团教育训练的高效开展,为组织建设和革命发展培育了大批骨干。

(二)明确基本单位,推动团内教育训练组织化、规范化

支部是团组织的细胞,也是开展团内教育训练的基本单位。1923年团中央第19号通告指出:“各地方团之训练教育及指挥工作,应以支部为单位。”[14]182 团三大强调:“支部、小组是教育训练团员的基本单位”[8]66。团中央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以后团内一切教育训练工作,须移到支部里面去进行”[15]193。以支部为基本单位,青年团逐步构建起团中央统一领导、团支部具体落实并且以具有灵活性针对性的个别教育为补充的团内教育训练组织体系,有效推动了团内教育训练的组织化、规范化。

首先,团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各地团组织有序规范开展团内教育训练的组织前提。团中央负责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委会议,为

全团教育训练工作制定统一政策;负责编辑、出版和分配党团刊物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普遍的供给团员,以作教育训练团员之工具”[8]67。团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先后负责为全团教育训练制定工作计划、工作要求并考查工作成绩。此外,团中央还经常派人到各地巡视考察、指导地方团组织开展教育工作。其次,团区委、地委及其宣传部或教育宣传委员会,负责当地团组织的教育训练工作。其主要职责包括:制定当地团内教育训练工作计划,指定团员阅读书目;宣传部或教育宣传委员会定期开会讨论教育材料与训练方法,由宣传委员到各支部作巡回演讲并发起讨论;地委委员参加支部会议,作政治报告,组织支部讨论,考查支部教育成绩;召集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交流教育训练经验和意见等。再次,作为基本单位的团支部,以定期召开支部会议为教育训练的主要方式,“支部会议,完全为本团教育机关”[16]216。支部会议召开频次多为每周一次,并制定详细的会议计划。支部会议尤其注重团员的发言讨论,甚至会“强迫”每位团员发言。支部通常提前指定书籍刊物由团员阅读研究,并在支部会议上进行汇报讨论或考问,最后由出席支部会议的地委或宣委同志考察团员的思想行为。此外,团支部还定期召开批评会,发动团员作相互间的批评与纠正,每月至少一次。“每开批评会一次同学都能诚恳承受,并能真实改悔,无有弊病。”[13]45 最后,开展具有灵活性、针对性的个别教育,作为经常性、普遍性的支部教育训练的补充。个别教育是针对特定团员如新团员、后进团员、团内负责同志作个别训练或个人谈话。北京地方团曾评价“个人谈话,此种训练最为有效,不特对于同志的个性行动等有极大帮助,即对主义认识亦有莫大益处。”[12]221

(三)研读报刊书籍,构筑团内教育训练理论阵地

报刊书籍是思想理论的重要载体,在团内教育训练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1922 年 1 月 15 日,青年团北京地方组织创办了《先驱》半月刊,后成为青年团最早的机关刊物,为统一全团思想、加强团员的马列主义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当时,青年团除了《先驱》外“并没有何种出版品”,且《先驱》常因种种障碍不能按时出刊,最终被迫于 1923 年 8 月停刊。施存统深感“须办一种对内的秘密的不定期刊物……以为训练及教育同志之用”,这种“团结同志的精神和激发同志的努力”的刊物,“无论如何非办不可”[7]287。1923 年 8 月,团二大作出决议:出版《团刊》作为教育团员及报告消息的机关刊物。1925 年 1 月,团三大作出决议:“中央应设法改善并增添本团刊物,须普遍的供给团员,以作教育训练团员之工具。”[8]67 同年初,创办团中央机关内部刊物《中学校刊》。除了团刊,《向导》《新青年》等党刊也成为团内教育训练的常用刊物。各地团组织十分重视团员对党团刊物的阅读与研究。北京地方团第一次大会将“必看团体刊物”定为团员“必须备有的最低资格”[12]161,团湖南第一届区委也定有“同志必须看机关报”的标准[17]50,长沙、安源、陕北等地团组织甚至会“强制”团员订阅党团刊物。

除了党团刊物,马列主义书籍也是团内开展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文本。1925 年 10 月,湖南湘乡团员彭士浩致信团中央,请求推荐团员应读书籍。团中央回信推荐了《社会问题概要》《资本论入门》《共产党宣言》等小册子,并指导他“研究主义须从浅处入手……若能将这些书细读数遍,对于主义之认识自有把握。”[17]316-317 除上述书籍外,《共产主义 ABC》《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浅释》等也常被团组织用作教育团员的教本。值得一提的是,张若名所著《马克思主义浅说》,原本是她在青年团旅欧支部学习会上的发言提纲,后在周恩来的协助下整理油印成单行本小册子,在团员和华工中散发。这本诞生于旅欧支部团内教育活动的小册子,几经辗转传到国内,在国内各个党团组织教育训练工作中发挥了更大、更持久的作用。但受经费困难、通信不畅、革命形势严峻等条件制约,地方团组织常面临无书刊可读的窘境。为了解决团员购读书刊困难的问题,济南、青岛、芜湖等地团组织设立了图书馆或图书室,为团员开展理论研究创造条件,“现借书之同志日见其多,情形尚称不错”[18]387。

(四)结合团外宣传,落实团内教育训练实践成果

教育宣传工作是青年团的根本工作之一。早期的群众宣传实践让青年团清醒地认识到,“对内训练是对外宣传的预备工夫,考核指导对外宣传工作,又是一种对内训练事业”,所以团外宣传与团内教育训练,是绝对不可分离的关系[8]322。青年团在群众中的宣传力、引领力,完全与团内教育训

练的成绩成正比。因此，要提升青年团的宣传力量，培养团员的宣传才能，“非对于马克思主义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和了解不可”[7]284。但团内教育训练却长期存在脱离实际的革命工作而专注理论研究的“学院主义”倾向。任弼时曾指出：“所谓增加训练工作，注意列宁主义教育，并非要同志们只顾房间的研究，因为本团是行动的组织，反对隔离实际生活的学院式的教育。”[8]337-338 为了纠正“学院主义”倾向，团中央多次作出指示：“我们的教育……乃是特别于行动方面训练团员”[8]65，“我们的正当训练方法，是根据实际的经验，融化理论的知识”[15]205，“所以以后各地团员应注意练习谈话演说的技能，多为有宣传意义的谈话与群众集会的演说”[8]54，“尤须引导一班同志参加实际活动去求得经验，养成工作能力”[15]193。可见，团中央格外重视和强调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进团内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团员的宣传能力。

遵照团中央指示精神，各地团组织也尤其注重结合实际的宣传工作，在实践中指导团员锻炼宣传能力，掌握宣传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提升宣传效能。首先，以经常性的革命宣传运动作为训练团员宣传能力的实践场域，由宣传经验丰富的团员言传身教，指导宣传能力欠缺的团员。重庆团组织领导人杨闇公，利用团的外围组织平民学社，每周组织多路团员外出演讲。他“常率不能讲演的同学一路，告以讲演的程序，以身作则，促其讲演，成绩颇佳。”团中央复信肯定道：“同志每周外出讲演，一以练习口才，二以推广宣传功效，此法须长久维持下去”[19]246-247。其次，在党（团）校训练班中，除作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外，尤其注重对实际工作的训练与讨论，将组织参与对外宣传活动纳入党（团）校教育内容。1926 年 1 月，湖南党、团区委在长沙合办寒假党校，于校内组织临时特支，召开大小会议三十余次，讨论党团员“怎样实际去参加工作”等问题。党校同志被派去参加公开的学生会议或工人会议，以练习主持各种会议的能力；还以支部小组为单位，组织演讲队发起讲演，“结果尚可”；并筹备寒假平民同乐会，召集三百余名工农听讲，“讲演及游艺均能引起听者之兴趣”[20]65。再次，于每次宣传运动后，由参与运动的同志或团组织召集会议，及时总结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不断增进团员宣传能力。团济南地委曾召集临时大会，审查 1925 年四五月间宣传工作的缺点，并批评每位团员在每次工作中的错误及缺点，“使每个同志经过一次宣传的工作，就得到一次宣传的经验与教训。采取每次的经验与教训，运用于以后的宣传机会上，成绩很好，我们今后拟照常举行。”团中央复信肯定道：“此次运动的缺点，校友们知道于中讨教训，若是真能如此做下去，则将来的进步是很大的，望校友们努力。”[18]404-405

三、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现实启示

青年团早期团内教育训练的实践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做出了卓越贡献，对新时代共青团开展团内教育训练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为党育人，恪守共青团矢志不渝的教育初心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荣传统。在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向共青团传达了“为党育人”的殷切希望。共青团是作为党的预备学校而建立的。吸纳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并将他们组织、教育成为忠诚强健的共产主义者，为党的事业培养新生力量，是共青团成立之初的首要工作任务。施存统曾发出“学习共产主义替共产党制造党员”[7]273，“开辟荒地做共产党的先驱，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7]326 的号召。可以说，“为党育人”是中国共青团创立伊始就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因此，新时代共青团团内教育训练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党育人”的教育初心，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党的初心使命感召青年，用党的光辉旗帜指引青年，用党的优良作风塑造青年，将对党的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厚植于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内心深处[21]8-9。

（二）以党带团，构建党团组织共学共建的工作格局

根据 2022 年 5 月共青团中央发布的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公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有共青团员 7371. 5 万名，其中学生团员 4381 万名[22]，占比近六成。青年学生还未步入社会，仍处在学习和成长阶段，思想不成熟、心智不完善。青年团早期也存在以学生团员为主的现象，因而团内教育训练被视为十分重要且迫切的工作。但当时团内教育训练的开展确有现实的困难，因为青年团员在认识上比较肤浅，缺少能够胜任团内教育训练工作的干部人才。因此，不仅青年团向党发出了指导教育工作的请求，党中央也高度

重视并多次作出帮助青年团改进内部教育训练工作的指示。尽管新时代团内教育训练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特点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青年学生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思想特点决定了他们仍需要党组织当好指路明灯。因此，各级党团组织在教育训练方面，应当形成“以党带团，共学共建”的工作格局，特别是高校党团组织，尤须强化组织间的紧密联系。团的支部会议可以请党员同志出席指导，党的组织生活会也可以请团员代表参加，定期召开党、团干部联席会议分享工作经验，共同组织理论学习会交流讨论。在高校学生团组织中，会存在若干名团员兼党员同志，这是学生团组织中的先进分子。任弼时认为：“使团内兼党员的分子增加，从而容易施行内部教育工作。”[23]173 可以说，团组织内的学生党员既是开展团内教育训练的宝贵人才，也是构建“以党带团，共学共建”工作格局的重要纽带。高校党团组织应格外重视团内学生党员的培养与任用，充分发挥其在团内教育训练工作中的党员引领作用。

（三）立足支部，发扬支部书记教育团员的主动精神

以支部为基本单位，是青年团早期开展团内教育训练积累的宝贵经验。那时的团组织已深刻认识到，“支部是团的教育和宣传学校——我们要学习无产阶级之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只有在支部中去学习。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行动无产阶级化，也只有在支部中才能达到这个目的。”[24]24 而团支部书记作为支部的领导者，“负有教育同志的责任”，“是每个同志的指导者”[24]27。团支部书记是否具备教育团员的责任意识和主动精神，往往成为决定支部教育训练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新时代团内教育训练工作，既要牢牢立足于团支部这一基本单位，发挥支部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团员的作用，严格落实“三会两制一课”制度，又要充分发扬团支部书记在支部教育训练中的主动精神。首先是提高能力的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的干部，必须提高工作能力”，“要有‘本领恐慌’的忧患意识”[25]82-83。当今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团支部书记只有主动学习新知识、磨炼新本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才能教育指导团员走在时代前列。其次是了解团员的主动精神。要为团员的指导者，先做团员的知心人。了解和分析支部团员的思想动态、行为特点、现实需要及优缺点等，是教育训练团员的基本前提。团支部书记要主动接触、了解团员，在政治、思想、工作、学习、生活上关心爱护团员，经常同团员谈话谈心。再次是责任担当的主动精神。团内教育训练既是团支部的一项经常性工作，也是团支部书记必须履行的一项重要职责。团支部书记要严格遵照团中央指示，组织实施“三会两制一课”，切实提高组织生活质量，加强团员思想政治教育和自我教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结合网络新媒体不断创新团内教育训练方式方法。最后是以身作则的主动精神。团支部书记的言行举止对支部团员有一定的示范引导作用。团支部书记要成为支部团员的良师益友，就必须以身作则，涵养高尚情操，坚定理想信念，严格要求自己，身体力行感召支部团员共同进步。

（四）与时俱进，推动共青团内教外宣工作的守正创新

“团的宣传工作，就其实质来讲，就是团的思想政治工作。”[26]100 根据对象的不同，团的宣传工作又可细分为团内教育训练和团外宣传两部分。团三大后，团内教育训练和团外宣传一度由组织部和宣传部分治，“致使在组织部指导之下的训练工作，每不能与宣传工作需要的相适应”[8]322。团中央意识到，“对外宣传与内部教育训练有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8]319，要使每位团员都能实际参加团的宣传工作，“非加增我们的训练工作……不足以应付目前工作的需要”[8]320。进入新时代，团的宣传工作呈现出新面貌，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在巩固传统宣传舆论阵地的基础上，共青团积极开拓网络舆论宣传新阵地。近年来，各级团组织把新媒体作为引导青年思想的突破口，成功开通运营各类新媒体平台官方账号，共青团网络宣传工作的舆论影响力、思想引领力、网络空间号召力不断增强，把握住网络思想引导的主动权，守卫好网络舆论宣传的主阵地。为适应新时代团的宣传工作新局面，各级团组织应针对传统宣传模式与网络宣传新模式，不断推动团内教育训练与团外宣传的守正创新。一方面，团组织应当把团员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作为新时代彰显团员先进性的重要方面，依托基层团组织、青年志愿者组织等，鼓励团员服务群众、奉献社会。另一方面，团组织应当教育引导团员带头绿色上网、文明上网，争做网络文明志愿者，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敢于发声亮剑、驳斥错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注释：

①中国共青团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组织名称，团一大确定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团三大更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由于本文的历史区间为1922年至1927年，涉及两种组织名称，为便于表述，本文在论述早期团内教育训练时，使用“青年团”。

②“S. Y.”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

③“C. P.”为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称。

④“C. Y.”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简称。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3]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8)[M].1957.

[5] 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6] 韩广富，赵佳佳.对青年团员转为中共党员相关问题的考证与分析[J].中共党史研究，2014(7):115-122.

[7]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15-1924)[M].1957.

[8]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M].1957.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1] 中共中央组织.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12] 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北京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2年-1926年)[M].1991.

[13] 长沙市革命纪念地办公室，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料[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14] 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年-1924年）[M].1983.

[15]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 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6-1927）[M].1957.

[16] 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19年-1924年）[M].1984.

[17] 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年)[M].1985.

[18]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种本第一集（1922年-1925年)[M].内部资料，1994.

[19]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年-1925年）[M].1986.

[20] 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6年)[M].1986.

[21]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2] 李川.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公报[N].中国青年报，2022-05-04.

[23]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革命领袖论共青团工作[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24] 中央档案馆，山东省档案馆.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种本1924年-1933年)[M].1996.

[2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26] 吴庆，等. 中国共青团发展报告(2015)[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马俊

“科创合肥”等六则

科创合肥

坐拥江淮，环抱巢湖。70 年前，还是小县城的合肥，因其“居皖之中”而成为安徽省会所在地。多年来，基础差、底子薄、体量小，在外界眼里，合肥一度缺少存在感。

思变求新，笃行致远。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主要创新指标稳居省会城市第一方阵，跻身全球科研城市榜前 20、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百强、国家创新型城市 10 强。科技创新爆发出巨大生产力，“十三五”期间，合肥 GDP 连跨 5 个千亿元台阶，2020 年，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进入全国城市经济 20 强，2021 年再进一位。今年上半年，合肥 GDP 增长 2.9%，增速与宁波并列居长三角 8 个万亿元城市首位。1 月份至 7 月份，合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进出口增速均居长三角 8 个万亿元城市首位。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说，合肥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

科创之都 厚积薄发

在合肥科学岛上，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运行 1056 秒，创造了世界纪录。

这是 2021 年我国十大科技重大突破之一。在这十大重大突破中，除“人造太阳”外，“量子”U 盘使光的存储时间提升至 1 小时，量子计算机“九章 2.0”和“祖冲之 2.0”问世，凯勒几何核心猜想被证明等，均创造了世界纪录。这些成果都诞生在合肥。2020 年 9 月，英国《自然》杂志发布“自然指数——科研城市 2020”排名，合肥跻身 20 强，评语是“非一线城市，有着一流的科研”。

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看，合肥依靠创新弯道超车，是有深厚文化基因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合肥，城区仅有 5 万人口、5 平方公里。这个从小城镇发展起来的全国移民城市，更具有包容的气度。

1969 年，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研究为主的中国科技大学准备从北京外迁，与多个城市洽谈未果。最终是合肥张开了双臂，中国科大于 1970 年初迁至合肥。正因为包容创新的环境，吸引了大量科研院所落户合肥。目前，合肥拥有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省部级科研院所近 200 家，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逾 20 万人，智力资源在全国同类城市名列前茅。多年来形成的原始创新队伍，成为合肥推进创新发展的宝贵财富。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

合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正是深刻认识并践行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放在了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

10 年来，合肥财政科技投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由 4%增至 14.2%，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由 2.78%增长到 3.52%，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增长 6.4 倍，技术合同交易额增长 8.8 倍；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由 4.4 件增长至 45.4 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25.8 件。

现在，合肥是全国 4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拥有首批国家实验室，是全国大科学装置最多的城市之一。如今的合肥，平均每天诞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4 户，每周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5 户，每月新增上市企业 1 户，每年净增市场主体 20 余万户。

从经济地理的角度看，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大背景下，地处中部的合肥所具有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人们曾笑言，合肥在地域上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但现在却成了合肥一大优势。这里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沿海的腹地，内地的前沿。“在以前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中，沿海城市有优势，但在新发展格局下，中部城市离消费人群更近，物流成本更低。”合肥市委常委、秘书长单虎说，高铁发挥了重要拉动作用，现在合肥有米字形高铁线路，未来还将成为高铁枢纽，将大大促进人员及各类资源的流动。

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在城市化中前期，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经济发展迅速，到城市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则出现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态势。

合肥把握这一趋势，顺应产业变革规律和国家战略方向，使科技、产业和资本融合推动产业迭代。“三者的打通融合产生了奇妙的反应，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的合肥，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合肥市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徐斌说。

一场蓄势已久的创新风潮，大大改变了合肥的经济格局。

创新有道 转化有方

合肥既注重原始创新，在高精尖领域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又依靠科学装置“沿途下蛋”，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有效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创新产业之间联接的机制。

(一)紧盯前沿，原始创新打头阵

在合肥西北的蜀山湖，有一座小岛，花木葱茏、清新幽静。它就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所在地——科学岛。

这犹如世外桃源般的小岛，以可控核聚变装置为代表，10 多座科学装置矗立于此，且均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等国计民生重点领域。目前这里已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实验等一批大科学装置，有等离子体所、智能所、强磁场中心等研究单元，以及 30 多个重点实验室。

依托科学岛，合肥规划了约 20 平方公里的大科学装置集中区。这些造价不菲的“国之重器”为前沿科学研究提供了强力支撑，对开拓研究领域、推动前沿突破至关重要。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指出，要对标世界一流，加强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坚力度。

紧盯前沿、谋划布局。按照规划，合肥以国家实验室为基石，依托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布局一批前沿交叉创新平台和产业创新转化平台。近年来，合肥规划的 12 个大科学装置，已经有 3 个问世、2 个在建。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党委书记黄晨光说，这些大科学装置，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也是催生原始创新和尖端科研成果的“利器”，能显著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国际科研话语权。

科学岛见证着合肥持续探索前沿科技的决心与雄心，也为未来新的产业革命积蓄能量。在研发端，“国字号”交叉研究平台加速布局，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合肥先进计算中心、合肥离子医学中心已投入运营，医算中心、物质中心、地空中心等科教基础设施正加快建设。在应用端，合肥与大院大所大学共建 30 多家新型研发机构，全方位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科学岛上开展的很多研究，都在聚焦原始创新、基础创新，探寻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力。

科学岛焕发出的活力，引发了合肥原始创新的一轮轮热潮。

(二)关注需求，产学研融合共进

在紧抓原始创新的同时，合肥一批衍生技术和成果加速落地。2021 年 10 月，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健康所发现了一种新型抑制剂，有望破解部分白血病患者治疗中的耐药难题。这些成果，依托的正是科学岛上的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

从建造至今，这一装置已累计运行超过 50 万个机时，为近 3000 项课题、2000 篇论文提供了实验条件。近日，该装置的混合磁体产生了 45.22 万高斯的稳态磁场，刷新了同类型磁体保持了 23 年的世界纪录，成为全球范围内可支持科学研究的最高稳态磁场。

“实验室的每一小步，都是稳定治疗效果的一大步。”药学团队带头人刘青松告诉记者，在稳态强磁场环境下，涉及生命科学的多项交叉研究正在稳步推进，生命医学团队已在科学岛上开发了针对急/慢性白血病、非小细胞肺癌、慢阻肺等疾

病的 20 多个小分子抑制剂候选药物。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主持召开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面向人民群众新需求，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快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总书记的话让我们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刘青松说,有重大科学装置的积累做依托,瞄准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科技创新既可“上接天线”,还能泽被百姓。

走进合肥离子医学中心,记者看到,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已完成性能检测和整机调试，正处于临床试验阶段。质子治疗是国际先进的新型放疗技术,无痛、无创,患者只需躺在治疗室内,接受质子射线照射,即可精准“狙击”癌细胞。

“依托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我们自主研发了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合肥中科离子医学技术装备公司总经理陈永华说，以前国内质子治疗设备大多从国外引进,费用不菲。面对国内癌症患者的迫切需求,科学家们开始思考,能不能通过自主研发降低患者成本?

2016 年,陈永华带领团队开始研制先进超导质子国产化治疗装置。去年 3 月,研制获得成功,设备占地更小、成本更低。投入使用后,患者治疗费用有望减少一半。“实践再次证明,核心技术要自主研发,等不来、买不来。市场有需求,科学家有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就要两者结合。”陈永华说。大科学装置为合肥创新发展开启了新境界。依托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研制出全球最紧凑超导回旋质子治疗系统;依托稳态强磁场装置,研发出国内首个急性髓系白血病靶向药；依托同步辐射光源装置,实现“大口径高阈值光栅”产业化,为我国高端激光器、光刻机等设备提供核心器件……合肥一批尖端科技落地开花。

(三)目标导向,推动成果有效转化

全球首台智能无线腔镜,“天问一号”环绕器探测雷达……在安徽创新馆，深藏于实验室的成果集中展现在公众面前，科技的强大力量令人震撼。

除集中展示创新产品以外，不少科研人员和企业代表也是安徽创新馆的常客。放眼望去,一楼展厅大屏幕上，正滚动播放着企业的技术需求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说,展览展示只是创新馆的部分功能,创新馆更是一个平台，为企业需求和科研成果牵线搭桥。

近日，一场重点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发布会在创新馆举行。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 11 个重点产业需求集中发榜,涉及 325 项关键核心技术需求,发榜总金额高达 7.98 亿元。一位企业家说,这样的方式让企业少走弯路、科学研究找到应用场景,一举两得、多方共赢。

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参观安徽创新馆时强调,要进一步夯实创新基础,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快培育新兴产业,锲而不舍、久久为功。

牢记殷殷嘱托,安徽创新馆围绕构建“政产学研用金”六位一体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科技成果就地交易、转化、应用。合肥市科技局局长范进说,创新馆成为成果转化主场,本身也是创新，有效解决了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的痛点和堵点。在科研人员眼里,这里就是科技成果大市场;在企业家眼里,这里又是永不落幕的“科交会”。

安徽创新馆开馆 3 年来，已累计举办科技成果转化活动 220 多场，发布科技成果 2600 多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金额超 400 亿元，培养持证技术经纪人 850 多名,服务企业近万家。

在合肥,创新馆的做法只是一个缩影。合肥出台了科技创新条例,成立了市委科创委,设立了合肥科技创新日。科技部门还组建了成果转化工作专班,常态化对接高校院所,建立可转化的科技成果库，与大院大所大学共建 35 个协同创新平台,全面推动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合肥的科技创新，已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打法。前有大科学装置,后有衍生成果落地;既聚焦原始创新,又注重成果转化。创新链条上的各个环节都在思考,怎样才能使科研和生产对接更顺畅、让科技成果转化更高效。

集聚要素 久久为功

合肥在聚焦引领性创新的同时，密切关注各要素之间的合作、协同、补位。创新因子有效汇聚,创新生态加速成型。

(一)引人、留人、成就人

创新从来不是易事。要攻坚克难，要久久为功,有时还要想新辙、出奇招。虽拥有科教优势,但

面临周边城市的竞争，面对日趋激烈技术迭代，合肥的创新难免遇到众多难题与瓶颈。

多年前，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生留学海外比例很高。那时，合肥虽手捧中科大金字招牌，但尚未成为创新创业者眼中的高地，选择留在合肥的中科大毕业生寥寥无几。甚至合肥工业大学等本土高校毕业生，也不把留在合肥当首选。

要创新，先要突破人才困境。当年合肥依靠诚意留下中科大，如今怎样才能吸引人、留住人？

“做科研更看重科研伙伴、科学装置、工作氛围等基础条件。”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副主任张欣坦言，10 年前，她被合肥的一流装置和科研氛围打动，和同为科学家的丈夫来到科学岛。一同前来的，还有一批他们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同学，当时曾引起了不小震动。科学家们为何选择合肥？有人总结，合肥能建好科学岛，胜在不急于求成；能引来高端人才，胜在出实招、求实效。

在科大讯飞合肥总部，人来人往的都是年轻人。“我们员工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一位员工说，今年高校毕业生招聘结束，平均年龄又要减两岁。

在合肥各类创新企业中，“90 后”渐成主力。一些手握高新技术的创业者，已成长为企业研发负责人甚至 CEO。东超科技公司创始人韩东成、范超，这两位在中科大读书时的上下铺兄弟，成功研发了可交互式空中成像技术的创新产品，在疫情中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针对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高级人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合肥开启“6311 工程”；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重点产业，合肥推出产业人才政策“7 条”；围绕高校新毕业生求职创业的难点痛点，合肥实施高校毕业生“9 条”……各类措施的密集出台，让合肥人才结构悄然生变。

2019 年 7 月，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首次发布的《合肥市人力资源发展状况白皮书》显示，在所有投递到合肥市范围的求职者当中，除了本市户籍人口，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上海、南京、北京，均为省外城市。合肥，让越来越多的外省份人才走进来、本土人才留下来。

2016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科技大学时指出，合肥这个地方是“养人”的，培养出了这么多优秀人才，是创新的天地。

养人，恰是合肥能够留住人才、有效创新的根本。科学家从海外赶来，毕业生愿意留下来，创业者慕名而来。这些四面八方到来的人才，为合肥积攒着创新的后劲。短短几年间，曾经缺资源、少名气的合肥焕然一新。

数据最有说服力：2021 年，合肥新增就业参保超 40 万人，其中大学生 25.9 万人；今年前 8 个月，合肥新增就业参保 26.8 万人，其中大学生 17.1 万人、占比 63.7%。“十三五”期间，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三大集群分别聚集人才 2.4 万人、2.5 万人、4.5 万人，为合肥产业“新地标”提供了有力保障。

如今的合肥，依托“国之重器”集聚全球科学家近 2000 名，以各种形式在合肥创新创业的两院院士 138 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852 人。创新策源地的活力不断累积、持续释放。

(二)投早、投小、投长远

科技创新要真刀真枪地干，离不开真金白银的投入。那么，钱从哪里来？

以往一些地方投资，不少是以国资平台自有资金或土地投资入股，并给予财政补贴等支持，这种做法可能使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扩大。

仅靠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力量有限，合肥的做法是，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同频共振，探索“科创+产业+资本”发展路径。

“用市场的逻辑谋事，用资本的力量干事。”合肥市国资委主任张毅说，合肥灵活运用基金，实现了“四两拨千斤”。今年初，合肥市政府设立总规模 200 亿元的引导母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各类专项基金，支持合肥科技创新发展。

国有资本领投，社会资本跟投。2022 年 6 月 10 日，河北金力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隔膜研发项目落地合肥，总投资 60 亿元，由政府引导母基金参股的海通国家中小基金引进，海通国家中小基金出资 6000 万元，其中政府引导母基金出资 900 万元。也就是说，政府引导母基金用 900 万元撬动了 60 亿元的项目。

“不再像过去那样撒胡椒面，专项基金拥有信息优势，可以敏锐捕捉到前沿新兴项目，能够集中力量花小钱办大事。”合肥市财政局局长黄永强说。

目前,合肥已形成以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产业投资基金为代表,总规模超过 1800 亿元的“基金丛林”,采用基金+产业、基金+基地、基金+项目等方式,为创新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资本、科技与产业之间的“藩篱”一步步被打破。在合肥维信诺科技有限公司展示厅,双曲面屏手机、波浪状电子书……各式各样的显示屏呈任意弯曲、折叠拉伸之态,令人叹为观止。

“这主要归功于第 6 代全柔 AMOLED 生产线。”维信诺公司党委书记唐伟说,为抢占新型显示竞争优势,2020 年维信诺谋划筹建第 6 代全柔 AMOLED。在缺少启动资金的关口,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领衔出资 60 亿元,社会资金跟投,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各类屏体 2800 万片,大大提升了我国显示技术的国际竞争力。

“国资领投,不是与民争利,不参与市场充分竞争的项目,只做社会资本不愿意干、地方经济发展急需干的事。”合肥市投资促进局局长吴文利说,合肥相继成立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兴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大平台各有侧重,或聚焦前沿性、开拓性技术突破,或扶持高新技术企业,或稳定支持重点产业,合力扶持合肥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合肥市各县区也相继建立了产业投资基金。合肥蜀山区政府引导基金已对外参股了 6 只基金,参股基金总规模 169 亿元,已对辖区内的 20 多家优质企业实施返投。合肥庐阳区依托庐阳科创集团平台嫁接社会资本,参与或组建的基金已包含长三角数字基金、合肥数字产业投资基金、庐阳天使基金等在内的 12 只基金,总规模突破 50 亿元。

紧紧围绕创新主线,10 年来,合肥国有资本累计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投入资金超过 1400 亿元,带动项目总投资超 4300 亿元。在政府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将更多资源投向创新。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公司总裁应勇说,从 2019 年至 2021 年,公司年研发投入从 6000 多万元逐步增加到 9000 多万元,研发人员占员工总数比例接近 50%。公司为世界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提供核心设备,推出了可以对接量子通信卫星的小型化卫星地面站等产品。

(三)扶弱、培新、送一程

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需建立高效的协同创新平台。孵化器作为科技成果的“催化剂”、促进转化的“助推器”、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成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合肥多措并举,加快孵化器建设发展,通过孵化器“扶弱、培新、送一程”做大创新产业。

合肥率先在全国取消申请建设孵化器运营单位设立年限,按照“达标即准”的原则,最大限度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兴建、运营孵化器,完善从团队到企业再到产业的一体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

在合肥高新区,探索建立了“瞪羚培育—瞪羚—潜在独角兽—独角兽”梯度培育体系,逐渐孵化出一批具有核心技术、发展潜力大的初创型雏鹰企业和具有行业带动性、平台孵化功能的龙头企业。

合肥高新区工委办副主任王邦春说,在高新区,有些企业已经很有名气,比如科大讯飞、科大国盾、四创电子、华米科技、阳光电源等,也因此形成了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信息、网络安全、生物医药、节能环保、光伏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集群。

一个从大科学装置启程、经过科研院所和前沿学科交叉研究及成果转化平台、再到创新型企业为路径的创新体系,在合肥日渐成型。

创新引领 厚植产业

一批引领性强、带动作用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合肥稳定增长、后发赶超坚实的底气,合肥高质量发展后劲十足。

“十三五”期间,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3.9%,对规上工业增加值贡献率高达 92.9%。“十四五”开局更呈蓬勃之势:2021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28.3%,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54.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6%,位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2 名。科创一子落,发展满盘活。

(一)新兴产业蓬勃生长

6 月 30 日,比亚迪合肥基地整车下线。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传福说:“比亚迪其他企业投产没有这么快的。”项目从签约到开工,用时 42 天;从开工到整车下线,用时仅 10 个月。

只有创新驱动才有这样的速度。合肥人认识到,科技和产业,如同左右脚,一只脚迈出去,另一只脚也得跟上去,才能稳步向前。他们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无中生有、小题大做,打造了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

近年来,合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强势发展,目前已聚集规模以上企业超过300家,涵盖整车、关键零部件、应用等全产业链。越来越多“合肥造”新能源汽车奔跑在大江南北:6月22日,大众安徽白车身顺利下线;今年9月份,蔚来新车将交付……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也将中国首个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研发的测试场建在了合肥,成为大众汽车全球研发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研发的合肥城市生命线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应用物联网技术成功预警燃气管网泄漏、供水管网泄漏等突发险情7000多起,成为城市安全的科技“哨兵”。目前,合肥市已构建了城市生命线安全产业研发、制造、工程、运营、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

核心科技攻坚克难,为合肥高质量发展添底气、增动力。“过去人们买一台大屏幕液晶电视要上万元,现在几千元就可以,液晶屏实现国产化是价格下降主要原因。”合肥市委常委袁飞说,合肥作为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液晶显示器依赖进口,“缺芯少屏”制约着行业发展。

为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合肥锁定新型显示、集成电路等领域进行攻关,先后建成三条TFT—LCD量产线、一条打印OLED试验线、一条硅基OLED小尺寸线,闯出一条显示产业快速发展之路。如今,合肥液晶面板出货面积已占到全球总量的10%,中国企业彻底告别“缺屏之痛”。

科创与产业同频共振,推动合肥产业不断进阶。走进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只见吊挂式天车来回穿梭,机械臂翻飞运作……公司业务副总经理周义亮说,晶合是安徽省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月产能已达10万片,不仅填补了中国大陆驱动芯片制造空白,液晶面板驱动芯片代工的市场占有率更是跃居全球第一。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说,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现代化水平。

总书记的期待,让合肥坚定了产业发展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抓住,传统优势产业也不能丢。惠而浦、海尔、格力等一批现代化企业陆续落地合肥,当地传统家电业搭上智能化、数字化的顺风车,电视、空调、洗衣机、冰箱等“四大件”产量连续11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夯基垒台,积厚成势。如今合肥有16条产业链相互嵌套,协同发展,迸发出澎湃之力。“芯屏汽合”“急终生智”成为现象级产业地标,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3个产业入选首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智能语音产业入选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获批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

目前,合肥拥有37个工业行业,200多个工业门类,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工业比重由2012年的9.4%升至2021年的31.9%,平均每年提升2个百分点,居全国城市第一方阵。

(二)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因科技而兴、因创新而进,科创已成为合肥最大标识,激发了当地企业自主创新的强大动力。越来越多合肥企业站在时代风口,超前谋划一批未来项目,勇闯无人区。

合肥的云飞路,被人们称为“量子大道”,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全球首颗微纳量子卫星、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球首条量子保密通信网络“京沪干线”等,均诞生在这条街上。国仪量子、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40余家企业扎根于此,共同放飞“量子梦想”。

“量子精密测量仪器是打开微观世界的一把钥匙。”10多年前,还在中科大少年班就读的贺羽,参加一场报告会时,被导师讲述的购买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却被“卡脖子”的经历震动。自此,贺羽心中种下了自主创新的种子。

有核心技术才有未来。2016年,24岁的贺羽创立国仪量子(合肥)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量子精密测量、量子计算等技术和高端科学仪器的研发和产业化。多年深耕,如今公司多项技术突破国际封锁,自主研发的我国首款商用脉冲式电子顺磁共振波谱仪,将市场价格拉低30%。“我们立志成为量子技术应用及科学仪器行业的全球领导

者。”贺羽信心满满。

科技竞争，比拼的不仅是爆发力，更是远见和耐力。合肥企业进军量子信息、城市安全、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领域，并不是追求现阶段的经济回报，更希望能取得技术进步，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凡事预则立，一批前瞻性企业在合肥渐次生长。作为人工智能的先行者，科大讯飞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产业生态，引领合肥在人工智能领域占位抢先。“截至今年6月底，讯飞开放平台已开放496项AI产品及能力，聚集超过343万开发者团队，总应用数超过151.7万。”科大讯飞品牌市场部总经理吴骏华说。以科大讯飞为中心，合肥建成全国首个国家级AI重要产业基地“中国声谷”，入驻企业超千家、营业收入超千亿元，一个人工智能产业高地已在合肥崛起。

合肥的产业布局远不止于此，他们还把目光瞄向了深空。去年下半年以来，合肥用超常规举措，推进包括地理信息在内的空天信息产业跨越式发展，集聚了中科星图、航天宏图、银河航天、天仪研究院等一批行业头部企业。

同时，各个产业之间相互促进影响，甚至融合。当物联网遇上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自动避障的智能网联汽车开始奔跑在合肥街头；当集成电路携手新型显示器，全球每售出8台电脑就有1台“合肥造”；当人工智能拥抱装备制造，工业机器人、新零售机器人等智能装备走进工厂、走入商场……

(三)建设良好创新生态

创新可无中生有、可兼收并蓄、可博采众长。合肥市委市政府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集聚丰富科创资源，塑造良好科创生态，奋力打造全球科创新枢纽。以创新为主线，不断夯实基础、勇攀高峰，合肥探寻到了摘掉后进标签、实现弯道超车的密码。

依靠科创，合肥已成创新创业沃土。2012年以来，合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由615户增至4578户、增长6.4倍，今年有望突破6000户。全市共有境内上市企业73家，居省会城市第6位，其中科创板上市企业16家，与成都并列省会城市第2位。

借力科创，合肥置身全新坐标系。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旁听生”到“插班生”，再飞身跃进“正式生”，奋力当好“上进生”，争当抢当“优等生”。合肥全面“入长”：G60科创走廊延长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蓬勃生长，轨道交通加速汇融，一体化公共服务提质升级……

投身科创，合肥锤炼出一批了解企业、懂得科技的领导干部。在投资方面，合肥练就出一支懂产业、通政策、会干事的“合肥投资战队”。“这个城市真的懂技术、懂产业。”北京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高级副总裁李晓飞说，去年2月份，公司选择将区域总部落地合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干部对行业很了解，个个都有几把刷子。

科技创新已烙印在合肥领导干部的灵魂深处。“前人栽树，后人浇水”“边浇水、边栽树”的优良传统在合肥传承。“合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保证支持科技创新政策的稳定性，没有一个项目在人事变动中被放弃、受影响。”合肥市市长罗云峰说。

昨天靠科创起家，今天靠科创成家，明天还要靠科创发家。面向未来，合肥聚焦科技创新再出发：努力打造创新引领的全国典范城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再攀创新新高地。

创新高地 有益探索

合肥因创新而赶超，给同样奔跑在创新路上的城市诸多启迪。

“合肥创新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打通当今前沿科技的产业化路径上探索新道路。”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研究员胥和平说，合肥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围绕国家战略布局，在量子、核聚变等国际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同时，合肥在前沿科技的产业应用上做了很好探索。

合肥在用资本撬动打通科技、产业上也有独到之处，有不少成功案例。“受资源禀赋不足等因素影响，合肥的家底相对薄弱，要加速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资本力量。”合肥市副市长朱胜利说，合肥以资本集聚助推创新链、产业链迈向高层次，实现耦合聚变，进而释放更强生产力、创造更多经济价值。

合肥创新发展另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地方债务水平不高，财政对土地依赖度不强，使合肥经济发展基础更为牢固。合肥抓住实体经济这个根

基,沿着培育产业链、创新链的思路,发展产业集群,同时产业之间互补互通,形成产业生态。

合肥市发展改革委主任拱艳说,合肥针对产业痛点,主攻产业链核心环节和价值链高端环节,从技术和产业前端介入,把家电、汽车制造等传统产业和新型显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都串联起来谋篇布局。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永恒命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市场缺陷,合肥的创新令人眼前一亮。

合肥市委市政府认识到,基础薄弱地区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市场发育不足,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可以通过认识、尊重、利用市场规律,有效应对市场失灵。合肥通过国有资本撬动等各种方式搭建平台、创建机制,利用市场的逻辑实现了创新策源、产业集聚。同时,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补位、协同推进的关系。

合肥的探索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为创新驱动提供制度保障。

对于合肥来说,创新是使命,更是责任。从育小育早到串珠成链,从突破前沿到赋能产业,从投石问路到掷地有声……创新成果,来之不易。看当下,创新是澎湃动能;谋未来,创新有无限潜力。虞爱华说,合肥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创新这一国策,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全面开启合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瞄准创新发力,合肥壮歌前行!

(作者:孙世芳、王 智、黄晓芳、梁睿、暴媛媛、李华林、雷雨田;来源:《经济日报》2022 年 9 月)

城湖共生:合肥新名片

——看大湖治理巢湖答卷

巢湖,连接长江,与淮河即将沟通,作为五大淡水湖之一,是我国生态版图上的一颗明珠。

合肥,一个快速奔跑的省会城市,十年经济总量翻了约 3 倍,全市常住人口近千万,承担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的新使命。

作为环大湖而居的省会城市,合肥用十年的生态实践,探寻着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的大湖治理方案。

大湖复绿

今年 7 月底,随着十八联圩湿地三期工程完成,总面积 100 平方公里、投资近 60 亿元的环巢湖十大湿地全面建成。从空中俯瞰,巢湖仿若银盘镶嵌于安徽大地,环巢湖十大湿地犹如一块块翡翠“串珠成链”,筑起环巢湖水生态、水安全屏障。

巢湖东临长江,西接大别山,每年有 40 亿立方米湖水入江。“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后,巢湖又将与淮河相连。

党的十八大以来,巢湖治理驶入快车道,展开新篇章。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以系统治理和生态修复为本,巢湖治理把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摆在重要位置。

穿行于十八联圩湿地,草丰水美,河汊纵横。合肥十八联圩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家政每天都会查看湿地内植物生长和水质净化情况。原先,这里是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肥东县长临渔场,李家政是渔场场长。2017 年,为了建设和保护湿地,渔场 3500 亩水面全部退养,200 余户养殖户全部退出。同时,周边 56 个自然村共有 1.2 万人退居。

十年来,环巢湖十大湿地退养面积达 1.5 万亩,退居 7005 户,他们中有的成为蓝藻捕捞工,有的成为湿地养护员,每日巡湖护水,见证巢湖生态向好。

合肥市还通过立法划出“红线”保护巢湖,相关地方法规明确规定,坚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采取生态补水、植被恢复、移民搬迁等措施,增强湿地生态功能。

走进合肥市肥西三河国家湿地公园,碧荷映日,群鸟翔集。这个 1800 余公顷的湿地公园地处巢湖西岸,湿地覆盖率已达 89.17%。3000 户居民退居、2000 余亩渔业退养,换得这里绿意盎然。

伴随湿地修复,生物多样性也稳步恢复。巢湖鸟类多样性调查负责人虞磊告诉记者,2006 年以前,巢湖流域鸟类种群只有 170 多种,2021 年以来,虞磊的调查小组已经发现鸟类 258 种,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种从“稀客”变为“常客”。

城湖共生

2011年7月,国务院同意安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政区划调整，巢湖自此成为合肥的内湖。合肥也成为环大湖而居的省会城市,开启了一座城与一片湖的共生发展新局。

在此之前,合肥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巢湖曾承受着“生态创伤”:城市污水汇入巢湖,湖水水质一度为劣Ⅴ类,巢湖也被合肥市民戏称为城市的“洗脚盆”。

“巢湖污染,问题在湖里,根子在岸上,根本上是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安徽省巢湖管理局局长余忠勇说。

通过成立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安徽省巢湖管理局、设立环巢湖生态保护治理资金池、构建巢湖治理项目库、打造巢湖治理智库,巢湖治理变“九龙治水”为“一龙管水”,走上流域治理、生态修复的治源之路。

摊开巢湖流域水系图,33条一级支流汇入巢湖。数据显示,巢湖污染一半来自城镇生活污染。治湖先治河,治河先治污。合肥市2012年以来投入约150亿元改造排水管网，新建一批城市污水处理厂，并提高出水标准，从源头上净化入湖水源。目前,合肥建成25座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量达292万吨。

合肥清溪净水厂的净水车间，隐藏在合肥西郊的一处开放式公园地下。这座全地埋式设计的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周边的城市污水，处理后的尾水通过城市内河流入巢湖。厂长助理王坤介绍说,为了控制入巢水质,合肥市要求污水处理厂提标升级,将出水水质标准提升到准Ⅳ类。

过量使用化肥等农业面源污染也是导致湖水污染的主因之一，合肥市在巢湖流域大力推广化肥农药减量替代等绿色农业生产方式。目前,巢湖一级保护区内已流转土地12万亩推广水稻绿色种植,实现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作为后发追赶型城市，合肥坚持以科技创新培育新兴产业。从新型显示到集成电路,从人工智能到新能源汽车,合肥逐渐发展起以“芯屏汽合”“集终生智”为代表的现代产业体系。统计显示,过去10年,合肥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近20%,比重已经占到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半壁江山。

2021年，合肥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同期,巢湖综合治理交出“成绩单”:2020年、2021年巢湖国控断面年度水质考核全面达标,巢湖全湖平均水质由2015年的劣Ⅴ类转为Ⅳ类,2016年以来,巢湖蓝藻水华总体呈下降趋势。

“经济发展,巢湖污染不增反减。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可以同时发力、相向而行、共生共荣的。”巢湖研究院院长朱青说。

发展新策

入秋,巢湖水随风涌动、烟波浩渺。今年底,引江济淮工程将全线试通水、试通航。届时，每秒300立方米长江水将源源不断流入巢湖。未来,这些水还可以通过巢湖流域的清水廊道流入淮河,为豫皖5000多万群众饮水安全提供保障。

从城市内湖到沟通长江、即将连通淮河的枢纽大湖,巢湖治理肩负着更重要的生态战略使命。

安徽省巢湖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作为长江下游的重要湖泊，巢湖占长江下游来水面积的11.3%，每年向长江输送水量约40亿立方米,近年来入江前的国控断面水质一直稳定保持在Ⅱ类。

近年来，巢湖综合治理理念已经从单一水体治污向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实现治巢护江转变。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治理”,巢湖治理的新蓝图正徐徐展开。

2021年6月,巢湖入选国家第一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十大工程”。按照规划，合肥市将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巢湖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合肥市副市长何逢阳说,站在新起点,巢湖将实现从水质达标向有鱼有草转变，从注重一湖治理向保护长江的转变。巢湖,将成为合肥的名片,当好长三角的生态屏障。

(作者:杨玉华、水金辰、刘美子、刘晓宇;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8月)

这场国家级“盛会”,为何选择在合肥举办?

9月5日至11日,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开幕式于5日在合肥市举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信办主任、国

家网信办主任庄荣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在开幕式上致辞，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候选人、书记处书记人选、党组成员杨宇栋出席开幕式并发言。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赵泽良出席开幕式并宣读获评首批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名单。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主持开幕式。

这场国家级“盛会”，为何选择在合肥举办？合肥以创新、产业、人才，给出响亮的答案。

科技创新，为网安赋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综合创新能力稳居全国创新型城市十强、世界区域创新集群百强的合肥，勇当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加速迈向享誉全球的“科创名城”。

近年来，合肥聚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

聚焦原始创新发力，服务保障“国之重器”，加快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世界一流的大科学装置集中区；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颁布《合肥市科技创新条例》，从法治层面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成立市委科技创新委员会，组建市科创集团、市人才集团，构建全市“一盘棋”推进创新发展的“大科技”格局；

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建立科研人员参加活动负面清单，实施科研项目经费“包干制”，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

设立“合肥科技创新日”，引领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聚焦难点、堵点和痛点，建立全链条、闭环式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推动科技与经济加速融合。

在网络安全领域，合肥创新能力非常突出。合肥拥有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国家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20 个。2020 年 11 月，合肥高新区获批工信部“网络安全创新应用先进示范”。

量子安全领域，中科大潘建伟团队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使我国成为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该团队还成功研制了目前国际上超导量子比特数量最多的量子计算原型机“祖冲之号”。此外，本源量子首个国产超导量子计算云平台在合肥上线。

人工智能安全领域，中科类脑“类脑智能开放平台”入选工信部“2020 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开放平台入选首批四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平台；新华三的“主动安全预警与处置系统”成功入围工信部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项目。

工控安全领域，和信科技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接入平台”入选工信部 2020 网络安全技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新华三的“工业互联网边界安全防护技术及产品”入选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

产业发展，为网安助力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支撑。

合肥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芯屏汽合”“急终生智”成为现象级产业地标，正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勇当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

合肥正聚力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高起点谋划布局，聚焦前沿科技和战新产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本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实现科创与产业同频共振。多领域推动产业集聚，坚持“领军企业—重大项目—产业链条—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强化全链条布局、全要素配置、全方位支持，构建“双龙头”引领、“多节点”支撑的产业链矩阵，打造战新产业集群。创新国资投入模式，构建“基金+项目”“基金+产业”“基金+基地”的资本筹建方式，以“基金丛林”搭建“创新雨林”、培植“产业森林”，打造总规模超千亿的国有基金丛林。不断放大政策效应，产业政策突出精准有效，金融政策突出融资服务，人才政策突出招才引智，土地政策突出优先保障，实施政策组合拳，引导发展资源向产业集中。

网络安全产业是合肥市 16 个重点战新产业链之一。目前，全市拥有网络与信息安全产业企业 15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51 家，集聚了新华三、中新网安、科大国创、和信科技等行业龙头企业，国盾量子、国科量子等具有前沿创新技术的领军企业，高维数据、达朴汇联等创新型中小企业，逐渐形成了“基础设施层—产品服务层—新兴应用层”网络安全产业链。

合肥市正围绕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以合肥高新区为核心，打造“中国

安全谷”,形成“一核带动、多点融合”的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企业内培外引,建设全域创新孵化,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集聚发展。

2019 年 9 月,“中国安全谷”获得安徽省委网信办复函支持。2020 年 5 月,合肥高新区获批安徽省网络与信息安全重大新兴产业基地。2021 年,合肥网络安全产业核心营业收入超百亿元,近年来年均产值同比增速达 20%以上。

以创新之“脉”,壮产业之“骨”,合肥,正挺起网络安全发展的“脊梁”,与强者共舞,与世界对话。

人才集聚,为网安护航

合肥是我国重要的科教基地,布局建设大科学装置 12 个,拥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近 60 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信息安全教学和研究的高校之一,2002 年成立信息安全专业,2016 年获批教育部首批“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7 年成立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获国家网信办和教育部门批准,成为我国首批“一流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高校,建有网络空间安全学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双一流”重点建设学科(量子信息与网络安全)。

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合肥市建设了“中国科大—中电科—安徽省网络空间研究院”,设立新华三大学等企业人才培训基地,培养“学术型+应用型”复合人才,通过优化完善“顶尖人才引进—基础人才培育—实用人才培训”的梯度人才培养体系,将合肥打造成为网络安全人才培育新高地。

近年来,合肥倾心、倾情、倾力,让各类人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活力充分涌流——目前合肥集聚各类人才超 200 万人,其中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 1.5 万人,每年吸引创业就业大学生超过 20 万人……

目前,合肥已拥有网络安全国家级高层次领军人才 50 多人,基础人才 1000 多人,从业人员近 5 万人。人才不断加速汇聚,为网络安全产业发展提供了核心支撑,新华三、科大国创等行业龙头企业迅猛发展,国盾量子、国科量子等具有前沿创新技术的领军企业高频出现,高维数据、达朴汇联等创新型中小企业快速成长。

随着网络安全科技的加速发展,合肥先后参与制定网络安全核心国家行业标准 20 余个,申请核心网络安全专利 200 余件,量子保密通信、主动防御等一批信息领域尖端技术、前沿成果加速产业化。目前,合肥在基础安全、人工智能安全、量子安全、工控安全、安全攻防五大领域形成了领先优势。

网安周花开合肥,其时已至,其势正兴。

(来源:“决策杂志”公众号 2022 年 9 月)

合肥登“门”入“室” 为科创产业“扶苗栽树”

合肥西郊的董铺半岛,被人们亲切地称之为“科学岛”,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所在地。

不足 3 平方公里的岛上,气氛静谧。大多数时候,低调得像是与世隔绝。但这里也是尖端技术的孕育地,拥有可控核聚变、稳态强磁场等大科学实验装置,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富矿。

这段时间,合肥成果转化专班第二小组组长、合肥科创集团副总经理黄叙新隔三差五便带着小组成员前来转转。他直言,登“门”(校门)入“室”(实验室)不为别的,只为“寻宝”。这是摸清可转化科技成果底数最有效的方式,进而才能把成果“宝藏”挖到市场,在合肥实现就地交易、就地转化。

今年 7 月份,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的闫清泉团队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

“我之前和闫老师打过多年交道,也知道他有过创业的经验,做过一种低成本电动汽车充电桩,做得也很成功。”黄叙新说,成果转化错综复杂,一名合格的成果转化专员,不光要懂融资,还得懂技术、懂政策、懂产业,只有这样,碰到好成果才能更好把握。在得知对方在实验室里研究了 4 年的机器人研发课题结题后,黄叙新觉得这是个机会。

技术成熟、应用广泛,能否转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黄叙新所在专班小组第一时间与闫清泉取得联系。经过现场考察、细致研判,专班小组得出结论:项目完成小试,市场认可度高,转化成功率会比较高。

紧接着，在专班小组帮助下，闫清泉申报了合肥市种子基金，能为初创科技企业提供项目启动资金，最高有200万元，并建立风险容忍机制，允许出现最高不超过50%的亏损。与此同时，对接落户场地，将办公地设置在中国蜀山科里科气科创驿站科学岛站，享受租金减免。

出发不容易，往前走更不容易，如何与市场“打交道”，成了科学家创始人的一大难题。闫清泉告诉人民网安徽频道，在选好场地、获得资金支持后，如何拥抱市场成为真正的企业掌门人，并非他所擅长的，也是他为之担心的地方。

“做科研很单纯，可以做到极致。但做企业家就必须要以市场的准则去要求，其中知识产权确权分割、股权架构、对接市场等问题尤为棘手，在吸纳社会资本时，如果分配占比不均衡，很容易就成为别人的公司。”闫清泉的担忧不无道理。

为了“照顾”到每一个可转化的科技成果，黄叙新有自己的办法：好的投资人是企业成长至关重要的因素，要找到好的投资人，用好投资人，为企业赋能。为此，他们通过撒网式寻找社会资本做原始股东，那种急着赚大钱的直接排除，眼光长远、不急功近利的纳入考虑范围内，再逐一谈判研究，上述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随着一系列产业化动作顺利开展，预计2022年9月底，闫清泉就将迎来自己的掌门生涯。

科研人员积极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并非无本之木。

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智能机械研究所智能感知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聂余满同样期待走出实验室，借力打通从成果到样品、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通道。

聂余满所在团队研究的半导体项目已达4年之久，已经到了可以成熟运用的阶段。他说，“酒香也怕巷子深”，这是科研单位长期以来面临的瓶颈。为了尽快把科研成果从实验室里“搬”出来，新项目再次进入他们的视野范围。

“我们把初创团队直接落地到中国蜀山科里科气科创驿站科学岛站4楼的创客空间，给他们三五个月，甚至一年的培育成长时间。什么时候成熟了，再决定是否成立公司。”黄叙新坦言，科技成果转化专班作为企业“从早期开始的长期合作伙伴”，是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重要支持力量。

除了为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提供融资支持，加速转化进程，也能够为企业成长提供指导，降低转化过程中的技术风险、经营管理风险，并通过整合多方面资源，助力企业开拓市场。

如今，聂余满接过交接棒，公司注册立项已经写在行程上，脸上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以上，其实只是成果转化专班其中一个小组日常工作的缩影。企业的成立，并不意味着服务的结束，他们会密切关注企业发展，根据企业需求进行股权融资、嫁接业务等，增强企业自身“造血”能力，把科技创新这一“最大变量”转变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增量”。

“今年，合肥市组建4个科技成果转化专班，对接中国科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工大、安大等22所在肥主要高校院所，建立可转化科技成果库。成立时，30名专班成员都来自安徽创新馆、国有平台公司和县(市)区、开发区等单位，运行近半年，更多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器、众创空间和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也加入进来，目前专班成员已扩展到50名，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高效结合。”合肥市委科创委办公室(市科技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们将组织科技成果转化专班走出去，将对接高校院所的范围从市内拓展到市外，以吸引更多科技成果在合肥转化，将合肥打造成科技成果转化的高地。”

（作者：吕欢欢、李希蒙；来源：“人民网——安徽频道”2022年9月）

日均增加4家“国字号”，合肥是如何做到的？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科技型企业的优秀代表，是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科技创新的主力军、集聚人才的主阵地，已成为反映区域创新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准。

2021年，合肥市净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简称“国家高企”）1250家、总数达到4578家，同比增长37.6%。2022年第一批申报国家高企经专家评审通过待公示企业2203户、同比增长34.3%。第二批申报国家高企向省高企认定办初审推荐

810 户、同比增长 6.8%。预计 2022 年国家高企总数有望突破 6000 户，同比增长 30%以上。也就是说，今年，合肥平均每天将增加 4 家国家高企。

过去的一年，合肥市国家高企数量缘何实现跃升？合肥市科技局负责人道出了答案：合肥市始终坚持创新核心地位，实施国家高企三年倍增行动，把培育科技型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抓手，强化政策引导，完善服务体系，建立起了“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企业—上市企业”培育全链条，让企业“骨骼”更强壮、“肌肉”更结实。

汇聚科技资源 多平台孵化企业

如今，合肥是全国 4 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拥有首批国家实验室，是全国大科学装置最多的城市之一。

依托浓厚的科技资源，合肥市深度挖掘大院大所大学“富矿”，按照“协同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原则，积极引进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科技资源，共 35 个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全市新型研发机构累计引进、孵化、培育企业 1032 家，清华合肥安全院“城市生命线系统”等成果获国家层面认可并向全国推广。

如何将“优势”变成“胜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一条必由之路。

东超科技是一家以空中成像技术为重点研发方向，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力量进行技术转化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合肥的科创资源，是企业成长的‘靠山’。”企业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短短六年时间，东超科技已经发展成为估值近 10 亿元的“独角兽”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品销量达一个亿。

合肥市科技局负责人介绍，合肥树牢“大科技成果转化”理念，制定科技成果转化三年攻坚行动方案，出台《合肥市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试行）》，完善科技成果捕捉、评价机制，建立健全种子、天使、双创等各类基金保障体系，支持成果转化形成的“三新”产品就地应用，覆盖科技成果培育、发现、评价、转化、应用全链条，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场”加速走向“应用场”，加快孵化科技型企业。

强化要素保障 优生态支持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个黄金证明。拿到了这个证明意味着即可享受优惠政策的大礼包，而在合肥市出台的政策下，对首次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给予 20 万元奖励。

“真金白银”的扶持无疑对企业有很大吸引力。“被认定为国家高企后，我们可以享受到更多、更好政策，让企业发展后劲更足、空间更广。”

从科创树苗成长为参天大树，企业的成长离不开城市的精心“浇灌”和培育。

合肥四维图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一表示，在肥成立近 3 年，企业发展十分顺利，未来将重点发力人工智能自动驾驶、高精度地图等业务板块，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及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产业高地。

借力合肥市各项政策支持、产业集群和人才集聚等优势，科大国创自 2014 年迁址总部基地以后，迅速进入发展快车道，除电信、电力等优势板块外，积极布局金融、交通、智慧城市等行业领域，布局高可信软件的研发，探索智慧+物流的业务。扩大规模之后的科大国创生产经营大幅改善，利润也持续上升，并成功上市。

科大国创党委书记、董事长董永东介绍，近年来，合肥市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为理念，通过建载体、搭平台、强政策、优服务，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创新创业沃土，这一系列举措也增强了科大国创敢于创业、勇于创新的能力和信心。

除了直接对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奖励，2021 年以来，合肥市出台了《2021 年合肥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科技创新政策）》，政策实施加速培育了企业创新主体，进一步壮大了国家高企数量规模，在政策持续支持激励下，合肥实现每天入库 20 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 4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十四五”末力争国家高企突破 10000 户

按照合肥市委市政府部署，为打造竞争优势突出、发展动能充沛的高成长企业梯队，持续做大做强企业创新主体，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地精准施策、做好服务，合肥市科技局于 2020 年启动为期三年的高企倍增行动。

该行动方案将发展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纳入“一把手”工程，做好国家高企培育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工作，解读好国家高企认定管理办法、工作指引，提高企业申报国家高企的意识和积极

性。

今年是三年倍增行动方案实施的最后一年，成果如何？

合肥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表示，2022 年力争全年净增国家高企 1500 户，总量突破 6000 户。到“十四五”末力争国家高企突破 10000 户。

国家高企的认定带动了企业在技术研发、自主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成长性和研发投入、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人员比例等创新要素的全面提升。国家高企群体的壮大，对推动全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1 年，在肥国家高企以占比 1.18%的企业数贡献了全市 20.45%的企业营收、14.3%的企业应纳所得税费总额、27.9%的企业利润总额、79.7%的企业研发费用总额。

合肥市科技局还于 2019 年启动了“合肥市高成长企业培育计划”。

据了解，通过近三年的培育工作，合肥市共挖掘了 646 户（不含重复申报）高成长企业，培育了协创物联、恒烁半导体等 4 家上市公司，此外，晶奇网络、晶合集成等 3 家企业已经过会，维天运通、恒信动力、埃科光电等不少于 6 家企业已经递交 IPO 材料，中水三立、伏达半导体等一批企业正在筹备上市，形成了每年上市几家储备一批的局面，为合肥市企业的快速成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和助力。

此外，合肥市科技部门正在制定《合肥国家高企“破万”三年行动计划》，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有平台、有培育体系、有“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就不难理解为何合肥高新技术企业实现如此大的跃升。

（来源：“合肥发布”公众号 2022 年 9 月）

安徽制造向“新”而行

安徽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正在举行的 2022 世界制造业大会上，奇瑞、江淮汽车新车型闪亮登场，国仪量子、国盾量子、本源量子等量子企业发布新技术、新产品……

全球约 10%的笔记本电脑、20%的液晶显示屏在安徽生产，全国每 3 台冰箱、4 台洗衣机、5 台空调都约有 1 台是“安徽制造”，近年来，安徽制造业表现亮眼。

过去 10 年间，安徽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9.9%，位居全国第三位；近两年，安徽制造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先后破万亿元，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走出一条科技创新赋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实现从“传统农业大省”向“新兴工业大省”的跨越发展。

新赛道——新兴产业活力强韧劲足

滁州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一块块光伏组件批量生产，井然有序。公司于 2018 年 1 月落户安徽省滁州市，眼下正打算扩大产能。

“这是第一家落户滁州的光伏龙头企业。”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合作促进局局长杨孝松介绍，目前滁州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企业已近 50 家，年产值超过 400 亿元。包括光伏产业在内，滁州已形成八大新兴产业。

滁州，是安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些年，安徽坚定不移把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中之重，实施第二产业提质扩量增效行动，确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大新兴产业展开布局。

新赛道，如何跑赢？

设立专班“顶格”推进重要产业。各专班由一位省领导挂帅，即“链长”，同时邀请龙头企业任“链主”。“发挥好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的作用。”安徽省政府办公厅营商环境处工作人员阎辉介绍，“链长”们考察营商环境、协调相关要素，指导“双招双引”（招商引资、招才引智）；“链主”们协助政府编制产业链全景图、“双招双引”路线图和施工图，实施精准招商。

先行入皖的新能源汽车蔚来汽车首席执行官李斌，说服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来合肥投资，项目从签约到开工用时 42 天，从动工到整车下线仅 10 个月；显示面板的头部企业京东方，希望其重

要配套商先导薄膜来合肥设基地，专班领导赴广东诚邀，最终先导薄膜落户地点距合肥京东方仅几公里。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还体现在基金招商。日前，省级财政出资设立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设三大基金群 16 只母基金，通过撬动社会化资本，最终形成总规模不低于 2000 亿元的省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体系。

优化营商环境，改变招商模式，同时采取“龙头+配套”“基地+基金”的打法，仅仅几年，安徽培育了 14 个千亿元产业、15 家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以及 4 个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稳定性得到锻造，一批有影响力的产业地标初显。

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安徽聚集了江淮、奇瑞、蔚来、大众、比亚迪等 10 家整车企业和 1200 家配套企业，2021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25 万辆，居全国第五；今年上半年达 19.15 万辆，同比增长 142.7%。

2012 年到 2021 年，安徽高新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4.7%，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9.8%，高技术制造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 61%，现代产业体系正加快构建。

新引擎——把创新作为最大动力

走进合肥荣事达电子电器集团智能全屋体验生活馆，灯光自动点亮，空调自行开启；一声“你好小达，播放音乐”，舒缓的旋律随即响起……“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科技创新为家电业升级带来新动力。”荣事达集团副总裁杨其武说。

连续 3 年入列世界 500 强企业的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新研制的铜基新材料产品，最薄仅 4.5 微米；去年刚被评定为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安徽澳德矿山机械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采煤机截齿在井下工作时可减少 95%以上的火花，使用寿命提高 1.5 倍……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靠‘引’，也靠‘育’。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才能培育产业‘根’的力量，‘长’出赢得未来的企业。”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孙东海说。

新引擎，如何点燃？

科技创新是新动力。气凝胶被称为“最轻固体材料”。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谢毅院士从 2014 年起组织团队攻关，数千次实验，研制出新型气凝胶制备技术，2018 年起进入中试实验。受制于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归属问题，这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成果，一度投产受阻。

“如果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进行了赋权改革，我们的成果产业化可能还需要更长时间。”安徽科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郑磊感叹。去年 12 月，企业成立，最近，他们正为大量气凝胶订单而忙碌。

新型创新联合体应运而生。2021 年底，工信部批复组建 4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2 家在安徽，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即为其中之一。科大讯飞牵头，联合 10 多家智能语音上下游企业和科研院所，形成了“企业+联盟”创新组织。有联盟企业反映，设备出厂质检时需要从声音上检测电机设备健康状况，能否由智能方式取代人工，杜绝差错风险？

智能语音创新中心科研团队“接题”攻关，研发出了一套工业声纹质检系统。“如果不是创新联合体模式，我们很难短时间内收集到如此多的行业关键共性需求，集中力量科研攻关。”中心总经理吴照江说。

把创新作为最大动力，安徽不断以制度创新推动原始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让科创之树结出产业之果——

实行科技攻关“揭榜挂帅”，首批 76 项“揭榜挂帅”攻关项目已完成近 1/3，8 项技术产品打破国外垄断；

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全省培育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 130 个，其中“羚羊”平台上线一年来，累计集聚 5159 款工业 APP，服务企业超 5 万家；

出台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隐形冠军”企业。到今年 7 月，安徽累计培育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3218 家，争创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77 户。

把制造业搞上去，创新驱动发展是核心。安徽省发改委主任陈军表示，安徽成为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离不开“科技创新策源地”和“改革开放新高地”的同步打造。

新格局——在开放中推进高质量发展

9 月 21 日下午，合肥北站物流基地，一列中欧班列缓缓驶出，满载着家电、轮胎、工业机械设备等货物，奔向万里之外的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

合肥今年开出的第595列中欧班列。

合肥海关关长辛建民提供了一组数据：今年上半年，安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659.4亿元，增长22.1%，其中笔记本电脑、太阳能电池出口分别增长26.7%、68.7%，汽车出口及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速均在50%以上。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发挥安徽创新活跃强劲、制造特色鲜明等优势，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和绿色发展样板区。

“这是新要求，更是新机遇。”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牛弩韬说，“需要我们在更加开放的格局中推进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新格局，如何布局？

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安徽加快先进制造业布局。牵头成立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加快建设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做好与沪苏浙的产业承接……2021年，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4167个，到位资金超9000亿元，占省外在皖投资项目数和金额的比重均接近60%。

加大开放合作力度，加快企业出海步伐。今年6月22日，大众汽车(安徽)有限公司首台白车身下线；总部位于合肥的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6月27日在德国哥廷根工厂设立电池生产运营基地，拉开了“欧洲造”计划。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安徽制造”在国际大循环中不断提升品质与品牌影响力。

自2018年起连续举办的世界制造业大会，既是“安徽制造”面向国内外的重要展示窗口与合作平台，也成为安徽加快制造业变革的重要机遇。在今年的大会上，已集中签约项目567项，总投资3794亿元，其中100亿元以上项目8个、50亿元以上项目15个。同时，7所部属高校也与安徽省签订产教融协议。

没有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就没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安徽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表示，安徽将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机遇，抓住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加快建成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兴产业聚集地。

(作者：吴焰、游仪；来源：《人民日报》2022年9月)

本栏目供稿、责任编辑：黄宁平

启 事

本栏目属转载文章，因客观原因未及与作者提前沟通，请作者看到本启事后，与本刊编辑部联系(电话：0551-62206629)，编辑部将按本刊相关制度向作者支付稿酬。

(上接第19页)

积极培养居民骨干和意见领袖，带动社区更好地开展各项活动。

(四)创新手段整合资源，不断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体系

目前，社区治理需要创新方式方法，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提高党建引领整合辖区资源的能力，提升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水平。首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为本，制定社区治理的可持续性方案，整合资源以保障社区治理的各阶段逐步、有计划开展。其次，继续优化轮席值日、社区协商议事等相关流程与机制，充分发挥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平台作用，整合区域力量开展共建共治。再次，适应“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平台建设的要求，加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用好大数据平台和新媒体工具，提升社区治理的智能化水平[3]。

参考文献：

[1] 张蓓蓓.以党建引领社区多元共治的实践与思考[J].新西部，2013(3)：48-49.

[2] 提佩，林霞.基层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基于北京长阳的实证研究[J].社会与公益，2019(2)：44-51.

[3] 吴卿昊.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逻辑解构与路径选择[J].重庆行政，2022(1)：80-83.

责任编辑：马俊

公益广告

图说 我们的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仁者爱人

孟子离娄 中卫書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西路901号
邮政编码：230031
电　　话：（0551）62206658　62206629
电子邮箱：XB1233@126.com

印　　刷：合肥新南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方式：自办发行
定　　价：5.00元

ISSN 1674-5000